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6月30日第10期 总第133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33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四）

目录

【专稿】

胡宗式 1966年北大关于聂元梓执行什么路线的辩论

——兼评《北京大学纪事》

附件一： 新北大东风兵团编印 新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十月初——十一月底（初稿）

附件二： 路远、周闯 搬开聂元梓 北大才能乱

附件三： 杨 勋 北大文化革命又处在关键时刻

——兼评聂元梓同志八月五日的广播讲话

附件四： 虎山行战斗团 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附件五： 聂元梓 在纪念“六·一”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答疑】

胡宗式 答郑实的质疑

【评论】

胡宗式 17日还是19日？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北京大学纪事》作者造假又一实例

【资料】

章 铎（抄录）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中的聂元梓和孙蓬一

【读者来信】

谢定国谈自己的文革日记

【版权声明】

【专稿】



作者简介：胡宗式，1941年4月生于天津市宁河县。1960年毕业于天津二中，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制六年）。毕业前夕发生文革，1966年12月成立“动态报”（也称“动态组”），一直工作到1968年8月工军宣队进校。之后分配到宝鸡902厂（现在的宝钛集团）。1971年1月至1973年3月清查“五一六”期间，被押回北大接受审查。工军宣队的结论是：“胡宗式跟着聂元梓犯政治错误，不予处分，不记档案，不作书面结论。”1992年任锻造分厂厂长，1996年任厂研究所所长，技术职称为教授级高工，享受政府津贴，2001年退休。退休后从事文革研究，著有《北京文革两派斗争亲历记》等。

1966年北大关于聂元梓执行什么路线的辩论

——兼评《北京大学纪事》

胡宗式

前言

1966年10月6日，物理系二年级的路远、周闯贴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下称《搬开》）的大字报，揭开关于聂元梓和校文革执行什么路线大辩论的序幕。各种观点和各个派别齐亮相，核心的问题是拥护聂元梓还是让聂元梓下台。搞清楚这一段历史，有助于理解北大的文化大革命。

大辩论中涉及到1966年8月5日聂元梓关于工作组问题的广播讲话。这个讲话的原文，我没有找到，只能从对立派批判这个讲话中找到部分内容，聂元梓说：

工作组是犯了路线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作组所犯错误的责任由组长张承先和副组长张德华来承担，大多数的组员要和他们区别开来。社教中的一些老左派，在工作组时期，跟着工作组犯了一些错误，有些人在工作组问题上表

现的保守。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借着清理工作组错误的机会，想把真正的革命左派一棍子打死，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必须与这种错误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筹委会号召全体北大的师生员工，要顾大体，识大局，加强团结，一致对敌，决不能斤斤计较内部分歧，而忘记了主要打击目标，使运动迷失方向，走向邪路。

我有幸得到1966年12月新北大东风兵团编印的一份油印材料，标题是《新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月初至十一月末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详见附件一，以下简称“东风兵团大事记”）。这份材料的优点，就是把辩论双方的观点都写出来了，对聂元梓的缺点也有自己的判断。编者在前言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一场空前伟大的群众革命，由于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没有抓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没有在工作组撤走后引导革命群众进一步彻底批判张承先工作组反动路线，肃清其影响；对大串联、红卫兵等新生事物缺乏敏感，支持不够，还不能更大胆充分的放手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在风雨中闯，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因此，北大运动难以进一步深入下去。一场大辩论势在难免。”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的文革部分（其1966年的内容，已刊登在《记忆》第114期上）是歪曲历史的杰作，它是按照“反聂即革命”的思维写的。对聂元梓有利的事情尽量不写，有些地方还加以歪曲和捏造。文革开始时期的“破四旧”，北京和全国毁坏了那么多的文物，但北大的文物却没有被损坏。当一批中学生来北大扫“四旧”时，聂元梓在广播中号召北大同学紧急奔赴学校西门，去保卫西门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和院里的一对华表。这件事两派都有人写了回忆文章，说法一致，但《北京大学纪事》却只字不提。

1966年10月以后，谭厚兰带领北师大红卫兵去砸“工业学大庆展览”、到大庆揪斗铁人王进喜。同期，北大在干什么呢？东风兵团大事记有如下记载：“10月5日晚上，校文革请来了32111英雄钻井队来校作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报告，广大革命师生深受鼓舞，决心在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这样的事，《北京大学纪事》也不记载。至于1967年以后的事情，因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以后再议。

我们的民族向来就有敬畏历史的传统。各朝史官坚持实事求是地直书，皇帝

是怕史官的。但时至今日，有些人却无视这个敬畏历史的传统，认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可以任意拿捏。

一、大辩论的起始

——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

路远、周闯贴出《搬开》大字报，打响了北大两条路线斗争辩论的头一炮。路远、周闯认为聂元梓是“铁盖子”，要“搬开”。大字报具体讲述了七个问题（详见附件二）。

聂元梓主张在斗陆平时，要注意文斗，不戴高帽子等。《搬开》认为：使文斗变成了“温斗”，实则是给北大抹黑。就是说斗得不够狠。《搬开》还对聂元梓不积极支持大串联、不同意成立红五类子弟协会等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聂元梓在1966年8月5日说工作组是人民内部矛盾。路远、周闯则认为：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结论。但群众只要这个结论就行了吗？同学中有部分人要坚持辩论，聂元梓同志你为什么不让展开辩论以肃清工作组影响？当初批判工作组，你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后来怎么想通的？

路远、周闯大字报的核心是认为聂元梓不够左，因而她要让位。

《北京大学纪事》不提路远、周闯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只有如下文字：

（1966年）10月6日

▲路远、周闯贴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说聂上台“没有干几件好事”，“劝其自动退位，当普通积极分子，对革命，对本人不无好处”。

对于大串联和斗陆平的问题，陶铸、王任重曾有过指示。1967年10月，地质学院“东方红”在他们的刊物《东方红》上发表的“天翻地覆慨而慷”一文中这样记载：

（1966年）八月二十七日，陶铸写信给北大校文革聂元梓同志，以“积极搞好本身的革命，创造好的经验”为借口，压制大串连。他写道，“派人出去，当然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为前提，这样支援才有力量，才更能起示范作用。”并斥责革命学生，如有的同学要去外地点革命之火，自己走了这当然不好……。”他一再鼓励北大校文革创造斗批改的“样板”，以作为他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引向

邪道的“领头羊”，陶办还指令，要将此信“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为分发”，结果流毒全国，各地的走资派拿着陶铸的鸡毛当令箭，压制大串连，大赶北京学生。王任重更为露骨，他叫北大校文革用“大辩论”的方式压制大串连，用“考验左派”，“组织纪律”来束缚群众，实在不行了，就稍微松一松，但规定串连人员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然而革命学生志在四方，敢去赴汤蹈火，人员依然源源外流，于是王任重破口大骂起来：“有些同学连十六条也不相信了。实在要走也没有关系，让他们去窜吧！东窜西窜，窜够了还会回来的。至多把运动推后两周。”并在三四千人外出的情况下硬叫筹委会选举校文革，“选完立即转入斗争黑帮。”

陶铸、王任重倒台后，有人指责聂元梓和他们的关系密切。现在，陶铸、王任重成了正面人物了，《北京大学纪事》也就不提这段往事了。

二、赵丰田的大字报

《东风兵团大事记》有如下记载：

十月十六日

哲四赵丰田贴出《拨开迷雾万千重，试看庐山真面目》的大字报。

赵画了一条北大运动发展的曲线，把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与张承先工作组等同起来，说校文革执行了一条反动路线，并解释道：

“当我说错误路线时，我是把它列入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范围里的，但同时又不是把所有的错误路线看成半斤八两，没有一点区别”，“不是那种最严重的典型，但这种情况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又具有典型性，又是一种典型。但这种类型更难发现，也比较难于辨认它的性质，需要充分的辩论，才有可能使群众的大多数认识它的路线性质。每个为此奋斗的人，都得做下这种精神准备”。

赵丰田大字报说“6·1”、“8·4”中央发表意见太早，北大群众锻炼得不够，给北大运动的曲折埋下了“伏线”，“先天不足”；老左派主导着北大的运动，学生的领袖人物没有锻炼出来，加上些左派“绝大部分”成了工作组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忠诚执行者（主要是认识问题——赵原注）他们“害怕群众”，“害怕清理”，“清理工作组走了过场”，是“折衷主义”。这样，必不可免的，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的是一条反动路线。

这张大字报是反聂元梓的理论基础。

三、上揪下扫的口号

中央在文革初期，对文革的进程有过说法：文化大革命分三个阶段：斗、批、改。斗，即斗黑帮，批，即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改，就是教育改革。具体怎么搞，谁也不清楚。1966年9月，校文革成立以后，有些大字报在讨论运动如何搞。在众多大字报中，郭罗基的大字报很有新意，他提出一个口号：“上揪下扫”，上揪，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源，下扫，扫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上揪，当时就是指揪李雪峰。后来，出于批判聂元梓的需要，把上揪扩大到刘少奇，说下扫是把群众打成反革命。

任何的政治口号都有它的背景和确切的含义。当时的历史是怎样的呢？请看1966年《东风兵团大事记》的记载：

十月十日

晚上，“五四”操场继续辩论。……大多数人认为“不在于搬了聂元梓，要害问题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会上还提“上揪下扫”是会后的大方向，“北大应该从李雪峰、张承先身上搞起来”，有人反对“上揪”要“下扫”，是要铲除“陆平的社会基础。”

会议还对阶级路线、大平反、大解放等发表了意见。

聂元梓在会上讲话说：“如果这条反动路线反映在我身上就批判我，文革执行了就批判文革，表现在哪，那个单位严重，就应斗争更厉害……当权派有决定作用，现在我是当权派，”“当然我是右倾，可以批判”，希望大家大力宣传这场辩论的意义。

十月十六日

晚，聂元梓发表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上揪李雪峰、张承先，下扫反动路线在北大的影响，哪有就扫到哪。“校文革有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揭发后再检查。”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在聂元梓发表广播讲话之前已经有了“上揪下扫”一说，聂元梓只是接过这个口号，并且说下扫也包括校文革。聂元梓在提“上揪下扫”口号时，也号召对自己提出批评，和现在某些人提的“下扫”的意义完全

不同。对聂的讲话有两种不同的反映，大部分同学认为“上揪下扫”是今后的方向，而井冈山红卫兵等则发表声明，认为聂“耍阴谋，放暗箭，”“想中间溜掉”，“扼杀大辩论”，并认为聂过去对大串联支持不够，现在又“放任自流”，是“大阴谋”。（《东风兵团大事记》）

井冈山红卫兵方面反对“上揪下扫”，是因为他们要进攻聂元梓，不能让她中间溜掉。

那么《北京大学纪事》对“上揪下扫”是怎样记述的呢？

（1966年）10月16日晚，聂元梓做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

（1967年）7月12日“新北大红旗飘”、“新北大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联合编辑的《新北大报》创刊号出版，发表题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长文章和《欢呼〈新北大报〉的诞生——代发刊词》。《代发刊词》批判《新北大》校刊，说它已堕落为扶植保守派、围剿革命派的驯服喉舌，堕落为孙蓬一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说“它鼓吹‘上揪下扫’，把‘井’、‘红’打成反动组织，残酷镇压……革命群众”。

（1970年）12月3日《内部通讯》继续刊登揭发批判“五一六”罪行的文章。主要内容为批判聂元梓的“野心家”言行，如“三年文化大革命白干了”、“17年掌权经验不能用了”，以及“上揪下扫”、“揪军内一小撮”等。

1967年以后及《北京大学纪事》对“上揪下扫”的批判，完全背离了原意，更有甚者，“上揪下扫”在1970年又成了“五一六”罪行。

四、什么是反动路线

文革开始，工作组进入许多单位，他们按反右斗争的思维来搞文革。工作组一进校，把群众分成左中右，人为地制造分裂。他们定下的积极分子是他们的依靠对象。在一些单位，这些人在开讨论会时，专门记录他人的发言，收集材料以备运动后期打右派之需，给人的感觉是工作组感兴趣的不是黑帮，而是运动后期的右派。北大工作组借口“6·18事件”在群众中抓“游鱼”，被打击的群众有40多人。其它高校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清华大学比北大更甚，抓的“游鱼”近800人。

工作组没有来得及大规模抓右派，就被毛泽东制止了。那么整群众的黑材料

哪里去了？一些工作组和积极分子否认整了黑材料。我所在的年级，工作组撤走时，工作组和积极分子信誓旦旦地否认整了黑材料。随着运动的发展，一些工作组的积极分子觉悟了，透露出整黑材料的事，群众之间的矛盾加大。到1967年元月初，反工作组的一方，抄了顽固分子的宿舍，抄出了黑材料。我认为聂元梓的“下扫”不力，在1967年和她谈过这个问题。她认为工作组撤走了，工作组的影响就没有了，把他们哲学系的情况推而广之，实际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年级工作组造成的影响存在很久，直到抄出“黑材料”，保工作组的势力才偃旗息鼓。

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让我们重温一下毛泽东的大字报吧：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五、杨勋、李志远的观点

1966年10月6日，经济系教员杨勋贴出题为《北大文化革命又处在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同志八月五日的广播讲话》的大字报（详见附件三）。关于杨勋的观点，《东风兵团大事记》有如下文字记载：

杨的主要论点是“全校运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校筹委、校文革“执行了一条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的错误路线”，在清除张承先反动路线在北大运动影响“这个关键问题上”“是采取了走过场的做法”。

杨说：“8月5日，聂元梓同志代表筹委会作了《对当前工作的几条建议》的广播讲话”，“是具有方向性错误的”，“基调”是“改良主义”的，聂元梓“把这种个别现象当成了当时的主要危险”，“（聂的话）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借着清理工作组的错误的机会，想把真正的革命左派（指某些追随过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志——杨原注）一棍子打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们必须与这种错误行为进行斗争。”

杨说：“当时主要危险是许多人害怕清理，抵制清理，从而有可能使清理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走过场。”

杨表示她与聂元梓有过斗争，被“排挤”出校文革，受到“将近二个月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围攻。”

这是一篇认为聂元梓为首的校筹委会、校文革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作之一。校刊转载了这篇大字报。杨勋说聂元梓及校文革执行了一条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没有说怎样做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她认为聂元梓没有理解康生、江青的指示，她对康生、江青的讲话理解得深入。她当时是筹委会的委员，对聂元梓的8.5讲话提过建议：关于聂元梓同志的这个讲话，校筹委会曾进行过讨论，在讨论时，我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没有被采纳。8月4日晚，在批判张承先的万人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给张承先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作了结论，在大会结束之前，我再一次建议聂元梓同志根据大会上康生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的精神修改广播讲话的内容，但没有被采纳。

李志远本是经济系教员，参加过抗日战争，资格较老，也是北大社教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为聂元梓的对立派。关于李志远的观点，《东风兵团大事记》记载如下：

十月三十日

经济系李志远《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问世（本月中旬杨勋有一张进一步阐述聂元梓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路线，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路线的大字报，李志远的大字报就是盖在这张大字报上面）李志远把聂元梓和陆平、张承先都说成了“革命的同路人”，有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取得政权后受到北大具有“深厚基础”的“习惯势力”，“个人主义，奴隶主义，折衷主义，形而上学，墨守陈规，害怕革命变动——”“这种习惯势力，是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总是倾向于保守，改良”，——的包围，于是就必然地实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李志远这套理论，公然为陆平，张承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开脱。就语句来说，也十分露骨，最明显的有“（陆平）的确乘革命之势，给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陆平这个为党派来的老干部，怎么竟把北大变成顽固的

堡垒，又怎么从一个反对资本主义勇士的领导人，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党派陆平来北大是为了改变北大党委过去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力的情况而加强党委领导的”等等。

李志远心目中的群众是陆平的“忠臣顺民”，无知和愚蠢，他们都是充塞着“个人主义，奴隶主义，折衷主义，形而上学，墨守陈规，害怕革命变动”，也就是李所谓的“社会基础”。

李志远这套理论是杨勋那套观点的更“抽象”，更“理论化”，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大暴露，这张大字报选择在十一月一日前两天发表不是偶然的。

李志远把陆平、张承先、聂元梓说成是同路人，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但北大党委把张磐石、^①聂元梓、王连龙^②等同起来，却是官方的意志体现。《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78）7月4日 校党委召开全校党员干部会，党委书记周林做报告：

（一）通过小整风，常委认为：北大的十七年，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基本的。只有紧密联系北大十七年的实际工作，批深批透“两个估计”，把张磐石、聂元梓、王连龙强加给北大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才能真正分清路线是非，彻底砸烂长期压在北大广大干部和群众头上的精神枷锁，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二）……在深入揭批聂元梓的斗争中，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整顿各系的领导班子。学校正在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

六、录音带事件及砸《新北大》校刊

北大“井冈山红卫兵”于1966年10月9日成立，最初的名称为“清华井冈山北大支队”。他们得到清华蒯大富和地质学院朱成昭的支持，11月加入“三司”。当时“三司”的宗旨是只吸收反工作组的组织，但北大井冈山却是个例外，它的宗旨是反聂元梓及校文革。10月15日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简称红联军）成立。

一些回忆北大文革的文章，常提起录音带事件，说“聂元梓1966年11月1日讲话时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聂元梓把录音带中的某些内容删去”。

^① 张磐石 1964年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② 王连龙 8341部队副政委 1969年3月来北大，北大军工宣队负责人、校革委会主任直至四人帮倒台。

1966年11月1日，校文革集会纪念“六一”五周年（第一张大字报广播之日），地点在东操场，我参加了这个大会。聂元梓在大会上讲话，谈校内和校外的形势。校外主要讲的是批判工作组和批判李雪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校内主要讲给校文革提意见的事和建议把6月1日定为校庆日。聂在讲话中没有说对立派“井冈山”、“红联军”是反动组织。在讲校外和校内运动形势之间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在现场听这个讲话，并没有感到聂元梓的讲话是把对立派打成反革命。

《东风兵团大事记》关于这件事记载如下：

十一月一日

下午，由于两派观点不同（指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我校同时召开两个大会，一个是《新北大捍卫毛泽东路线联络站》等所属单位继续十月二十九日的纪念毛主席支持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五周年，继续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东操场），聂元梓参加了这个大会讲了话，郑重宣布校文革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诞生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北京大学校文革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建议把“六·一”作为校庆纪念日。我校及外地革命师生参加了大会。

另一个是新北大《井冈山》、《红联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新北大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等开的“纪念‘六·一’五周年”大会（五四操场）。“倡议书”说要“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北大以聂元梓为代表的革委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批判李雪峰发言短而空，重点是批判聂元梓及校筹委、校文革执行了“一条新的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这条路线的特点是改良主义”。经济系杨勋坐在主席台中央。这是一个大方向错误的大会。

会议中途，由于“五四”广场各地革命师生往东操场过来，“五四”会场主席团派来两个人，不经过主席团就要拉聂元梓过去。会议出现了争论和混乱现象。聂元梓说过不过去要经过大会主席团，说要站在这个无产阶级讲台上讲话。聂元梓针对李志远大字报还念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主席语录。聂元梓的讲话与《新北大》第二期刊载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谈不上“篡改”，是一个充满

革命精神，坚持了原则立场的讲话。

大会开过不久，“井冈山”、“红联军”方面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段语录是指他们，把他们说成反动组织，提出抗议。聂元梓在临湖轩召开校文革委员听录音，讨论此事。我和陶一飞当时在“批判李雪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工作，正好有事找聂元梓。聂说你们也来听听。听过以后，在场的人开始议论，发言的人都说没有问题。校文革常委侯汉清也表态说没有问题，我、陶一飞也是如此。散会后聂元梓把录音带拿走，叫广播台的人删去了这段语录。

聂元梓的讲话刊登在1966年11月5日《新北大》上。我把它全文转载于后（详见附录五），这里引用一部分。我的印象聂元梓讲话时在校外形势和校内形势之间加入这条语录，由黑体表示：

《红旗》十三期社论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我们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按照十六条和林彪同志在庆祝我国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彻底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在当前如果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个目标，都是不正确的，而且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我郑重宣布：北京大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诞生的，它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北京大学校文革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但这些缺点和错误，即便有些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也是在革命前进道路上所产生的，是在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因此，我们衷心欢迎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严格的批评，那怕是尖锐的、激烈的。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有的同志也在召开“纪念‘六·一’五周年大会”，“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他们的大会主要是“批

判北大以聂元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给他们的大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不能去参加他们的会，因为我们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们在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欢迎同志们提出严格的批评，但我们决不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登上被批判的讲台。

后来录音带不知怎样到了对立派的手里，好像是通过历史系的李炳煌借的。一天晚上9点左右，李炳煌约我陪他找“井冈山”的头头魏秀芬要录音带。魏秀芬是地球物理系学生，她是校田径队跳跃组成员，我是组长，彼此是熟悉的。我们到35斋，敲开她宿舍门，她出来把门带上。李炳煌讲明来意，魏秀芬大声说：“这么晚了。你们两个大男人，来女生宿舍干什么！”说完，转身开门回房，不再理我们。她开门的瞬间我们看到她屋里还坐个男生。

《东风兵团大事记》记载：

十一月六日

《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站》对十一月一日东操场大会录音带磁带问题发表声明，提出井冈山等久借录音带不还，多次交涉无效，种种建议遭到拒绝，令人怀疑它失去了原始意义，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新北大》的主编原是杨克明，他参与起草第一张大字报，《北京大学纪事》有记载：（1966年）8月1日 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聂元梓、杨克明、张恩慈因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笼中有功，奉命列席全会。后来他和聂元梓发生矛盾，在两条路线的辩论时，《新北大》也刊登对立派的文章。10月底杨克明外出串联后，聂元梓改组了编辑部。新的编辑部不再刊登对立派的文章，引起了对立派的不满。11月5日《新北大》刊登的聂元梓讲话没有上述这段语录，不久，“井冈山”“红联军”以此为借口砸了《新北大》编辑部。请看《东风兵团大事记》的记载：

十一月十二日

下午五时许，《红联军》、《井冈山》等单位二十来人破窗砸门，闯入校刊临时编辑部，毫不讲理，非法禁闭工作人员，截断电话线，翻箱倒柜，撕碎公共书籍，档案材料撒了一地，校刊十九、二十期乱扔一地，任人践踏……最后还抱走公章和钥匙和私人的来访日记和钥匙。由于混乱，把“毛主席万岁”的标语贴在沙发上，在挂有主席像的墙上写着“造反有理”，“打倒奴隶主义”等口号。

晚上，毁坏现场不少本校和外地革命师生参观，有两种不同意见。大多数认为这是违反十六条的。亦有人不敢谈十六条，强词夺理，扬言“如不‘乱’，还要砸”、“砸出一个新北大来”。

这一天，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在北大，晚上她到了现场。

“井冈山”等单位11月14日晚上向常委会提出：要求广播台单独为他们广播，《新北大》在复刊时（事实上校刊并没停刊），每期出刊前要和他们协商等。（见《东风兵团大事记》11月21日）

“井冈山”“红联军”砸了《新北大》编辑部后，聂元梓将此事上报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中央文革何人，怎样说的，我没有查到原文）。于是校文革把“井冈山”的头头魏秀芬送到公安部门。

在这段时间，“红联军”偷了校广播台的器材，建立自己的广播站，“新北大红卫兵尖刀连”砸了经济系办公室。

《东风兵团大事记》记载：

十一月二十六日

深夜十二时许，新北大红卫兵尖刀连等单位闯进四院，砸破旁门玻璃，进入经济系档案室，撬开文件柜，抢走部分档案材料和一些黑材料。尖刀连他们的人建议把黑材料放进档案柜以便封存，他们单方面封的文件柜和档案室的门，并单方面声明“谁也不能启封之”，晚上，自己又来砸了。

砸档案室时，经济系彭澎闻声出来要保护国家机密，受到斥骂，拖拉，和限制人身自由。彭澎想去常委会受到纠缠。有一个同志还被他们反锁在屋子里，出不来。

新北大红卫兵尖刀连单方面声明解散了临时小组。

十一月二十七日

校广播台晚上对哲学楼前和“五四”操场丢失喇叭、变压器一事发表通告。紧接着“红色造反广播台”大播《红色尖刀连》声明，说抢的都是黑材料，并扬言要公开，又声明他们偷来的广播器材不准别人拆走。

《北京大学纪事》对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情，是这样记载的：

11月1日 校文革集会纪念“六一”（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之日）五周年，

继续批判李雪峰。聂元梓在会上建议将六一作为北大校庆日。

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六个组织，也举行了“纪念六一”五周年群众大会，着重批判聂元梓、校文革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发表倡议书，号召批判聂元梓、校文革的这条“反动路线”。

11月8日

▲井冈山红卫兵建立广播站。

11月12日 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红联军等五个造反组织砸抄了《新北大》编辑部，同时贴出《告北大和全国革命同志书——砸烂〈新北大〉编辑部》的大字报。它说：“《新北大》登出的聂元梓纪念‘六一’五周年讲话是‘伪造品’，删掉了聂元梓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言辞，充当了聂元梓执行资反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同）的遮羞布。”

12月19~21日 聂元梓在反击“十二月黑风”的口号下，开始批斗、抓捕“井冈山”“红联军”的重要成员。从12月19日至21日，红旗兵团等组织日夜开会，批斗“井”、“红”成员杨炳章、乔兼武。

12月23日 红旗兵团等组织查封井冈山红卫兵和红联军。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直至“井冈山”砸校刊，聂元梓和校文革没有把任何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在中央文革把砸《新北大》定成反革命事件之后，校文革才把“井冈山”和“红联军”作为反动组织对待。现在来看，这是不对的。凡事都有因有果，北京大学的一些领导，为了批判聂元梓，不再谈因，只讲果。其潜台词就是：打砸抢的行为是正确的。1969年6月，迟群、谢静宜们领导控制下的北京大学，就是这样。《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69年）6月26日《北京大学简报》说：全校通过讲用会，提出了“井”（井冈山红卫兵）、“红”（红色造反联军）问题。《简报》说：“1966年10月至1967年2月，从‘井’、‘红’成立到被摧垮，聂元梓等人犯了严重错误。他们在‘反聂即反动’的口号下，将‘井’‘红’视作反动组织，揪斗了‘井’、‘红’战士二百多名，其中一百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1967年元月底和二月初，北大参加北京市多个单位的夺权斗争。在高教部和北师大、学部发生冲突，受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的严厉批评。聂元梓召回各路夺权队伍，在学校内开始整风。1967年3月3日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大字报揭出了聂元梓涂抹录音带的事，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

《北京大学纪事》

3月3日 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大字报揭出了聂元梓涂抹录音带的事，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聂的不满。校文革常委徐运朴、侯汉清支持郭的大字报，与聂、孙分裂。

起初，聂元梓不承认修改了录音带。侯汉清找到我和陶一飞（陶一飞当时在校大批判组），约我俩调查录音带的事。我们到广播台询问有关人员，其回答问题支支吾吾。我问他当时拿了几台录音机？他说：两台。我们听了录音，听到有摁键的卡卡声。那时的录音机在修改磁带时，必须两台一起用，且会留下痕迹。调查后我们三人联名写了一份大字报，讲了聂元梓修改录音带的过程。大字报贴在大饭厅东面门的上方，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后来聂元梓在广播上承认修改了录音带。侯汉清认为聂元梓的政治品质有问题，便和她分道扬镳。我和陶一飞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重，继续在新北大公社的相关部门工作。

动态报的大多数人支持郭罗基的大字报。1967年3月6日出版的动态报第73期报道：动态报胡宗式等十二人贴出题为“新北大整风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必须开门整风，聂元梓同志必须带头，某些常委的包袱必须卸掉，整掉私心杂念，整掉保守思想”“迅速把由郭罗基同志这张大字报引起的辩论引入正轨”“郭罗基同志的大字报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对这张大字报的围攻更是错误的”“希望聂元梓同志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在夺私字权方面也不愧为一面旗帜”。

动态报第85期第3版“校内动态”：

哲二“烈火战斗队”于19日贴出题为《郭罗基大字报‘再版’前言》、《郭罗基的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的大字报，指出“郭罗基的大字报，代表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助长了无政府思想，配合了当前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为

了彻底批判这一条资产阶级整风方针，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决定公布郭罗基大字报原稿，公布他的修改过程，绝非把矛头对准郭罗基同志个人，而是为了对准郭的大字报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大字报揭露说：“大字报稿在出笼一个星期前就写好了，就在这一个星期，郭几乎天天到哲二来，进行频频准备活动。”“到三月二日晚，郭就把大字报稿送来了，……当时有同学看出，大字报贴出后可能给‘井冈山’、‘红联军’钻空子，要求郭加上这方面的内容，郭才加上了警告井冈山、红联军的那段话，帮郭抄大字报的同学‘建议把国际饭店的问题删去，郭执意不肯’”，同学又提出，如果要“提，也应该讲清当时的客观情况，……但郭坚决不同意写上去。”郭的大字报原稿有这样一段话：“当周闯、路远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后，你慌慌张张地召开会议，说是‘革命的大字报’，后来王力、关锋同志对你表示支持，你又趾高气扬起来，以至十一月一日在东操场作了那样一个讲话，以后连自己都觉得要收回，……”当我们问郭对聂元梓十一月一日讲话的看法时，郭说不知道讲话的内容，而是指态度，那就更荒唐了，连内容也不知道，怎么又会知道聂元梓的态度如何呢？我们不禁要问，郭罗基这样做的用心何在呢？”

从哲二“烈火”的大字报可以看出，郭罗基并不知道聂元梓1966年11月1日讲话的内容，当然就不知聂元梓修改了什么。

七、虎山行、毛林陈之兵、乔兼武

1966年11~12月，在社会上有一股批评林彪和中央文革的风——当时称12月黑风。这股风在北大也有反映：有“虎山行”的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有“毛林陈之兵”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从炮轰中央文革谈起》。“虎山行”的大字报，我找到了全文（详见附录三）；“毛林陈之兵”的大字报没有找到原文。对于12月黑风，中央文革号召全市的造反派给予反击。北大也对虎山行和毛林陈之兵进行了批判。对他们进行批判的有支持聂元梓的，也有反对聂元梓的。这从“虎山行”的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本身就可以看出：

北京大学文革常委会的呼吁中说：“最近在北京，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刮起了一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和翻案的妖风，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指向坚持和毛主席站在一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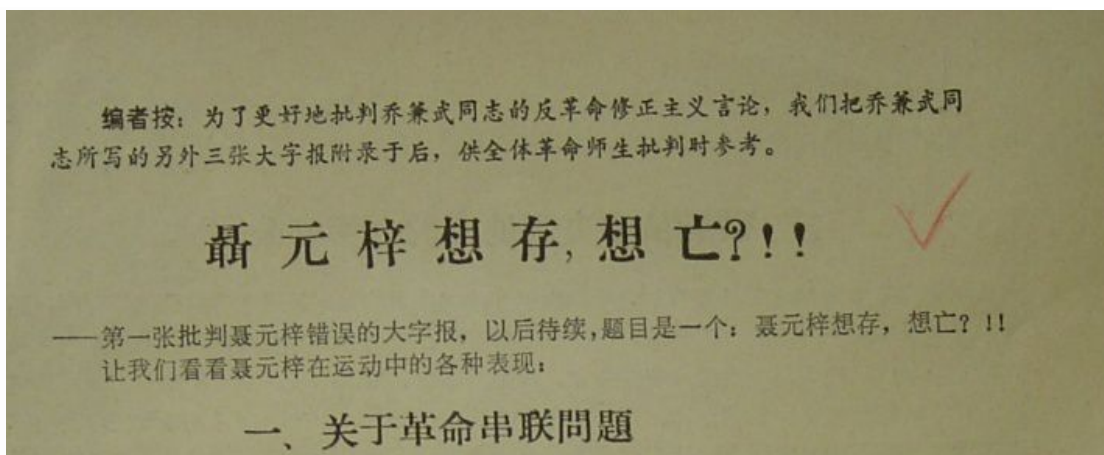
康生、江青等同志，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于是乎，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北京大学红卫兵，东风兵团，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等等战斗团体争先恐后的大施恐吓战术，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呀，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呀，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呀，等等，好不吓人！而吓人最甚者，骂声最狠且最高的要数井冈山红卫兵及所属战斗团，导演这出吓人战术最积极最卖力的也是井冈山红卫兵及其所属战斗团。

“虎山行”的《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大字报本身只是说：目前在许多单位展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辩论，就绝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之关键！目前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主流是健康的，好得很！

他们并没有提具体的意见。他们太相信大民主了。自从在民主的前面加上定语“毛主席的”，其实就只有一家之言了。

同期受批判的还有乔兼武。他于8月30日贴了一份《造三个大反》的大字报，一时引起轰动，反对的人多，支持的人少。我曾在大字报前面，看见乔兼武和别人辩论。在批判这张大字报期间，有的调门很高，但他的人身是自由的。校文革出版的大字报选称他为“同志”：

“为了更好地批判乔兼武同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我们把乔兼武同志所写的另外三张大字报附录于后，供全体革命师生批判时参考”（见下图）。这份材料是我从“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查到并进行照相。遗憾的是，我照相时没有照封面，不知道是第几期。逮捕乔兼武的原因，是他写了一份支持伊林、淦西1966年11月15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伊林、淦西是北农大附中的学生）。乔兼武的大字报还没有贴出，就被他的同学看见并揭发出来，造成牢狱之灾。



乔兼武的“造三个大反”的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造三个大反

第一， 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了妨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旧的组织形式，应该立即取缔、改革，代之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由群众自己创建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式的群众性组织——革命委员会。

一、 现行党团组织形式的罪状如下：

1. 他们不利于群众运动。
2. 他们不受群众监督。
3. 他们疏远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妨碍领导和群众实行结合。因而，某些领导严重脱离群众，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高高在上，当官作老爷，严重地产生官僚主义。
4. 他们不利于把毛泽东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不利于贯彻执行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5. 采取入党的方式鉴别别人、考验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科学的。采取入党的方式鉴别别人，就容易给投机分子以钻空子的机会。
6. 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里的复辟与继续沿用党团组织不能是没有关系的。
7. 有些坏的党组织盗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名义，利用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把群众引入歧途，群众也往往上当，提出保卫某某基层党组织就是保卫党中央。

二、 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指导思想

它克服了党团组织所有弊病，是大搞群众运动的最好形式，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组织形式，是高度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最好形式，是用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贯彻毛泽东思想方针政策的最好组织形式。总之，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好组织形式。

三、 对把党团组织改革为革命委员会的几点意见：

第二、党政合一为革命委员会

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办公室的工作制度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制度，不是无产阶级的工作制度，而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的工作制度，因为它脱离群众、脱离生产劳动。

以上是我们三项大胆的建议。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毛泽东主义的光辉哺育我们成长。我们是毛泽东主义的红卫兵，是最高指示的忠实执行者。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北京大学东语系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乔兼武 杜文革 八月三十日

这篇文章是年轻人的突发奇想，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是一个改进党的作风的建议，其中指出的问题现在也存在。

八、抓杨勋

杨勋与聂元梓，可以说恩与仇同在。杨勋的弟弟杨炳章是位好学青年，他想来北大经济系旁听。杨勋是经济系的老师，聂元梓是经济系副主任。杨勋找到聂元梓，聂元梓批准了。1964年北大社教时，杨勋也是左派。工作组撤走以后，聂元梓组建筹委会，杨勋是委员。后来发生分歧，杨勋站在聂元梓对立派一边。以她的观点，没有理由把她抓起来。1966年12月23日，聂元梓派人把杨勋送到公安部。

杨炳章是1966年12月19日被抓。两派都对杨炳章进行了批判。1966年12月25日“北京公社”07支队“红岩”战斗队编写的《北京大学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载于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大字报组编“大字报选”（四）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这样记载：

十二月二十一日

早上，由“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红教工”联合在五四操场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杨炳章、乔兼武誓师大会”。到会数千人，群情激昂。而“井冈山”、“红色尖刀连”同时在大饭厅举行斗争杨炳章大会，由于一意孤行，不予合作，以致人数寥寥无几，草草收场。

杨勋那么卖力地为“井冈山”站台，“井冈山”还去批判她的弟弟，世界真奇妙！

《聂元梓回忆录》第490页谈到关于抓杨勋的事：

我跟康生还有过一次面谈。是关于抓杨勋的事。

杨勋是北大经济系的青年教师，她和她的弟弟、在北大旁听的杨炳章，曾经给党中央毛主席上书，讲他们关于文革的意见，得罪了江青。在社会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间，兴起了一股反对中央文革的思潮，杨勋等参与了有关活动，被指责为是“反中央文革”。后来，杨勋在北大又成为反对我的“反聂派”。两件事情纠缠在一起。一九六七年一月（引者注：应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康生指示我，要让学生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去。过了一两天，他通知我说要到他那里去，而且必须很快就到。我到了钓鱼台康生住处以后，康生说，上次催你让群众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你办了没有？我说我办了。我叫学生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几点几分已经送到了。于是，康生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报告总理杨勋已经被抓了。周总理说那么查一下吧。然后，康生又打电话给谢富治，问公安部有没有收到北大扭送来的杨勋，谢富治回答说收到了。康生又打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同时还说了另外一个人。由此可见，抓杨勋是总理指示的，不是康生指示的。外边都以为是康生叫我抓杨勋的，以为杨勋被抓是因为她在北大反对我，并且就此指责我在北大“镇压真正的革命造反派”。逮捕我的时候，就让杨勋站在台上揭发批判我，抓杨勋成为我的一条罪状。但是，在许多场合，我都没有对此事进行过分辩，没有讲此事是周总理的指示，宁可受到许多冤屈，也没有说出实情。我觉得应该保

护周总理的声誉。我从小就给党做情报工作，而且是为党的最高层领导做情报工作（抗战初期在太原时与刘贯一、聂元素一起，从事直接报送毛、周、朱、彭等人的情报工作），我懂得要严守秘密，有些事情就是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关于抓杨勋这件事，新校长周林进校后我曾向他写信说过，他置之不理。所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我的时候，在大会上还作为一条罪状叫杨勋控诉我呢！在市公安局第七处监狱预审的时候，才讲清楚我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抓杨勋的。

杨勋在“我经历的北大文革/四清试点和文革初期遭遇”（此文写作时间不详，有的网站2012年登录此文）一文中详细描述这件事：

（7月25日万人大会）江青最后很恳切地对大家说：“毛主席非常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想了解运动中的情况，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到中南海来反映，主席很想见同志们。”她最后还高呼：“同志们万岁！”

7月25日夜里，北大师生对江青的讲话议论纷纷，后来听说各系因评论江青讲话被打成反革命的全校共有30人左右。但是，谁也没有听信她的话，去找毛主席反映情况，只有我那二十岁的傻老弟杨炳章把江青的话当真了，第二天一大早就从他临时住的19楼到佟府来找我。他约我进城去中南海找毛主席反映文革情况。我对他的这个主意开始非常冷淡，一是因为我有1959年上书被批的教训，对毛主席也不是那样神往了；另外一个原因是“7·25”万人大会上，江青留给人的印象不好，对她的话将信将疑，觉得毛主席是不会随便接见群众的。杨炳章当时年轻气盛，满腔热情一心要见毛主席，坚持要我陪他去。他说昨晚他在东操场是坐在哲学系的队伍里，还是在最前面。他高中时钻研过黑格尔的逻辑学、辩证法，自称会相面，神秘地对我说：“你看出江青那表情吗？她同康生关系不正常，我们得建议毛主席：不能让她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我听了他的话很吃惊，但仔细想想江青当时的表情，她的言行，的确有点不正常，而且面对她那些胡言乱语，在场的人们谁也无法劝阻她。这很使人担心。当时心想：她是主席夫人，可能除了毛主席谁也管不了她。因为我从万云那里早就知道一些江青的脾气，对于她在北大的表演就特别的敏感，真怕她惹出乱子来。认为真要出问题，还得直接反映给毛主席啊！

杨炳章带上了他早已写好的一封信和几张反映运动情况的校园大字报手抄件，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材料直接交给毛主席。江青既然说毛主席想见革命群众，还是可能见

到的。我被他说服了，同意跟他一起进城去中南海找毛主席。我们从佟府出发，先到了中关园一公寓李志远家。我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李志远，然后就满怀信心地离开了他家。李志远的儿子李为群送我们出大门并预祝我们成功。

大约9点钟左右，我们到了中南海一新华门，门岗叫我们去文革接待站。在文革接待站我们填写了登记表就去吃早点了。大约半小时后我们回到了接待站，只见一个中年干部迎面走来招呼我们快上车，一边说：“你们登了记怎么不在这里等着，到处乱跑什么？快上车，首长要接见你们。”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叫到我们，于是立即上了他的车，也不问去哪里。我和杨炳章坐在小轿车的后面，带我们的那位中年干部坐在前面司机旁的位子上。我们谁也不说话，车子从长安街往回开，最后开到了三里河——钓鱼台国宾馆，进了那园子往右边方向走，最后在一幢别墅楼前停下了。

陪我们的那位中年干部把我们领到一个会客室的门口。他让杨炳章在门外的椅子上等着，叫我进去见首长。一进门只见江青坐在一个红沙发上等我们，杨炳章不肯在外面等候，他坚持要进去。江青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就问那青年人是谁，我说是一个学生，她就喊：“戚本禹，叫那大学生也进来。”我这才知道那中年干部就是戚本禹！江青很关心北大的情况，因为她当晚还要去北大主持全校大会！我向她谈了工作组的情况，6·18的情况，她还说她是诸城人，我们是山东老乡！

杨炳章迫不及待地要求见毛主席，江青说毛主席很忙，今天不能见，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她讲，她会转达毛主席。杨炳章无视江青，坚持要见毛主席，还说有些材料和信件要交给毛主席。江青说：“信和材料可以交她代转。”杨炳章不肯，还是坚持要亲自交给毛主席。最后，真有些僵了，江青的脸色变了，不高兴地说：“你这个要求太高了吧！”杨炳章只好勉强地把他的信和材料交给了江青。信的内容非常简单，好象只有几行字，主要是建议毛主席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并说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将会给毛主席老人家带来麻烦等。

我没有仔细去看那信，只见他最后的署名是“杨勋、杨炳章（杨勋弟）”。我们把信留下就离开了钓鱼台，回了家，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引出什么后果。

现在许多人写文章，说他（她）在那时就看出江青如何如何，大多不可靠、不可信。但杨勋、杨炳章建议毛主席不要让江青出来工作，有据可查。他们的见

识和胆略让人钦佩。

九、从“反聂即反动”到“反聂即革命”

在批判聂元梓的文章中，常常引用“反聂即反动”的口号，说聂元梓在“反聂即反动”的口号下，对不同意见的人，采取打压。引用时也不说明出处，也许根本没有出处。

1966年11月，在北大校内，因为大部分人外出串连了，北大的学生很少，大字报也少，基本上都集中在大饭厅前。我那时留在学校，介入两派的争论。反聂的一派是“井冈山”和“红联军”。当时在他们的大字报中就出现了“反聂即反动”的字眼，但不说明聂元梓何时何地说过“反聂即反动”。有一张批驳他们的大字报，大意是这样的：“反聂即反动”是井冈山红联军制造出来的一个口号，自己设一个靶子，自己来打。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聂元梓会说“反聂即反动”。任何的口号都要放在两条路线中来看。当聂元梓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你来反对她，你当然是反动。

到了文革40多年后的今天，“反聂即反动”变成了反聂即革命。北大的某些领导通过《北京大学纪事》（1998年出版，2008年再版）告诉读者，北大的文革就是反聂和保聂的斗争：

（1978年）9月1日 校党委召开全校落实党的政策大会，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及其代理人聂元梓、王连龙等人践踏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的罪行；推翻他们制造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错案和清队假经验，为受到诬陷打击的干部、教师、工人、学生昭雪平反。

（1979年）11月13日 11月10日、13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研究学习问题和年前工作。……高铁说，最近邓副主席批评过我们两次，一次关于生活问题，已经传达过了。另一次，在政治局讨论文化部文件的会上，邓副主席又批评了北大。邓副主席说：“发扬民主的方针不放弃。但讲民主也要讲集中，讲自由也要讲纪律。北大有争论，有几个人要踢开党委。郭罗基要调走。对有的同志要批评，批评方能保住旗帜。大字报要求改组党委，学生大字报的要求是合理的。闹，实际上是聂元梓的人”。（黑体是引者加的）

十、结束语

文革伊始，全民族亢奋，除极少数人外，都积极支持和参与文化大革命。但有谁能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呢？在1966年批判工作组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时髦用语，什么事情都往“两条路线”上套。路远、周闯的大字报，还有杨勋、李志远的大字报等，都说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认为聂元梓批斗陆平太“温”了，对大串联、红卫兵支持不够，对工作组的批判不力，不支持成立红五类子弟协会等等，都是聂元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

1966年的聂元梓是要紧跟毛主席的，她的第一张大字报、斗黑帮、给邓小平贴《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上海串联、对孔繁、杨克明的批判和把井、红打成反动组织等等，都是左的表现。有些人则站在更“左”的立场上批判聂元梓，抓一些自己不满意的事，硬是往路线上拉。

对于聂元梓的评价可以有各种看法。但是，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不应该变的。对于文革的揭示、研究不会止于当前。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特别是像《北京大学纪事》这类重要著作，更要注重真实而不偏见。 ■

附件一：

新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

（10月初——11月底）

新北大东风兵团编印

1966年12月

十月初至十一月末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把全国人民发动起来了！五个月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一直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破产。北大的五个月，是充满惊心动魄的五个月，是革命路线走向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向失败的五个月。

“5·25”大字报的产生和发表，是两条路线经过长期尖锐斗争的结果，是

毛泽东思想新的胜利。它的斗争锋芒不仅是对准陆平、宋硕，而且是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制定者。因此，它不仅遭到陆平黑帮的围攻，而且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雪峰亲自出马的镇压。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点燃了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一声惊雷，就如火山爆发，烈火以燎原之势，燃遍北京，红遍全国震惊了整个世界。

然而，从中央到地方的资产阶级路线代表人物，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和围剿革命左派，实行白色恐怖，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强加到北大革命师生头上的张承先工作组，把北大刚燃正旺的熊熊烈火引向了死亡的边缘！

在文化革命的紧急关头，主席回到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制定了《十六条》，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并一次次地接见了来自各地的革命群众，文化大革命又蓬蓬勃勃地走向了新的局面！主席关怀北大，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了北大反工作组的革命派，正如江青同志所说的那样，北大的革命烈火又高高升起！在聂元梓为首的校筹委会，校文革的领导下基本执行了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掀起活学活用毛著运动，实行人民战争忆苦思甜启发阶级觉悟斗争陆平黑帮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一场空前伟大的群众革命，由于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没有抓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没有在工作组撤走后引导革命群众进一步彻底批判张承先工作组反动路线，肃清其影响；对大串联、红卫兵等新生事物缺乏敏感，支持不够，还不能更大胆充分的放手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在风雨中闯，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因此，北大运动难以进一步深入下去。一场大辩论势在难免。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清华、北航、地质等一些兄弟院校的斗争还相当复杂尖锐。在那里工作组撤走时没接受批判，反动路线通过新的形式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过去被打击的少数派得不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于是，少数派联合起来，坚持了近二个月的顽强艰苦的斗争。穷追反动路线的根子，得到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和称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斗争的浪潮冲击北大，一场两条路线的大辩论势在必然！

.....

十月一日

林彪同志在国庆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人民日报》、《红旗》十三期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十六条，是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于是，从北京到全国，掀起了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十月五日

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有力的打击、彻底放手发动群众的关键措施之一。

晚上，校文革请来了32111英雄钻井队来校作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报告，广大革命师生深受鼓舞，决心在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

十月六日

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全国在京革命师生也参加了。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大会传达了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紧急指示”，江青同志代表主席和中央讲话，热烈赞扬了革命造反派。大会批判谭立夫的发言，掀起了一个新的革命风暴。

路远、周闯《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贴掉了“5·25”大字报复制品，勇敢地打响了北大两条路线大辩论的头一炮。大字报尖锐地指出校文革存在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认为聂元梓是“铁盖子”要“搬开”。北大一湖平静水给扔进了猛石，整个校园动荡起来了。

相继发表的是经济系杨勋的大字报《北大文化革命又处在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同志八月五日的广播讲话》。

杨的主要论点是“全校运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校筹委、校文革“执行了一条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的错误路线”，在清除张承先反动路线在北大运动影响“这个关键问题上”“是采取了走过场的做法”。

杨说：“8月5日，聂元梓同志代表筹委会作了《对当前工作的几条建议》的广播讲话”，“是具有方向性错误的”，“基调”是“改良主义”的，聂元梓“把这种个别现象当成了当时的主要危险”，“（聂的话）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借着清理工作组的错误的机会，想把真正的革命左派（指某些追随过张承先

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志——杨原注）一棍子打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必须与这种错误行为进行斗争。”

杨说：“当时主要危险是许多人害怕清理，抵制清理，从而有可能使清理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走过场。”

杨表示她与聂元梓有过斗争，被“排挤”出校文革，受到“将近二个月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围攻。”

杨说：斗过黑帮，办了展览馆，有论战和辩论会，北大好像真的成了其他单位传授经验的“橱窗”了。“但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吗？革命的队伍真正形成了吗？陆平、彭珮云黑帮斗倒斗臭了吗？校文革选举真的符合十六条中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吗？运动真正触及灵魂了吗？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吗？”

杨勋这一连串的质问，也就是当时辩论的一些中心问题，另外还有展览馆突出了什么、批判乔兼武违反了十六条没有，红卫兵统一等等问题。

这是一篇认为聂元梓为首的校筹委会、校文革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作之一。校刊转载了这篇大字报。

十月七日

《新北大》十四期发表社论“欢迎这场大辩论”。

下午，在“五四”操场召开全校革命师生大会。聂元梓作动员报告，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投身大辩论，表示欢迎对校文革、对她本人、对各级文革来一个“大检查、大批判、大总结”。会上传达了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聂元梓代表校文革对平反表示了态。

晚上，“五四”操场有辩论会。一般反映不太好，辩不起来。

清华革命师生强烈要求揪王光美回校检查，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清华的影响。

十月十日

《人民日报》刊登林彪同志关于把活学活用毛著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指示。我校革命师生纷纷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决心从“老三篇”学起。从改造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着手。

晚上，“五四”操场继续辩论。与此同时，《北京公社》红卫兵和战斗团发

起了以“如何挽救这场大辩论的方向”的串联，参加者较为广泛，会后发表。

会上，大多数人认为“关键不在于搬了聂元梓，要害问题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有的同志指出：“遵义会议是解决领导问题，而最后解决问题是四二年整风才决定。”亦有人说：“要夺权，不合适的人都要罢掉”。

会上还提“上揪下扫”是会后的大方向，“北大应该从李雪峰、张承先身上搞起来”，有人反对“上揪”要“下扫”，是要铲除“陆平的社会基础。”

会议还对阶级路线、太平反、大解放等发表了意见。

聂元梓在会上讲话说：“如果这条路线反映在我身上就批判我，文革执行了就批判文革，表现在哪，那个单位严重，就应斗争更厉害……当权派有决定作用，现在我是当权派，”“当然我是右倾，可以批判”，希望大家大力宣传这场辩论的意义。

哲学系孙月才等贴出《绝不允许炮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大字报指出：“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乘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跳将出来，企图浑水摸鱼，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全校哗然。

十月十一日

校系文革领导开了会，纷纷表示和群众一起投身对前段工作进行“大检查、大批判、大总结”，甘当群众小学生。

下午，在“五四”操场举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誓师大会。孔繁代表校文革发了言。

晚上，为了响应林副主席号召，校文革特邀学毛著积极分子冯玉萍、顾阿 两位同志来校作生动报告。

十月十二日

北大、北师大、清华等七日——十二日掀起一个揪李雪峰为代表的反动路线的浪潮。

哲学系《风雷激》发表《要彻底革命，不要改良派》。大字报说，两条路线斗争到了“新的阶段上”，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了更隐瞒更精致的形式，即改良主义”。大字报（提）到了聂元梓等哲学系一些左派（即学校主要左派力量）犯了改良主义的“历史根源”。

（一）过去与陆平黑帮斗争“主要限于”干部路线和阶级路线，他们都是

陆平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和执行者”，“习惯于这条路线”。

(二) 他们“比较限于对上的斗争”，对于系的学生干部，建党问题同样没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三) 过去的斗争“是完全脱离广大群众的孤立的斗争”。“他们有一种很坏的习气，就是惯于在各种工作中不走群众路线”，“这是他们斗争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没有和陆平黑帮争取接班人的一个重要表现。”

(四) 过去工作不抓毛著学习，不突出政治，不注意政治思想教育。

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大字报。

十月十三日

校文革平反小组晚上在“五四”操场宣读关于平反工作的开展问题。

大辩论以来，事实摆了几部就完了，问题是怎样理解，怎样上纲的问题。有人认为校文革是“右倾”，“严重右倾”，有认为是“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亦有认为聂元梓是“名利主义的典型”，“没阶级感情”，“没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的……

《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认为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公社》则认为“大辩论处在危急中”。

各种战斗团纷纷成立。

首都革命师生代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第一次彻底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北大的《延安》战斗队在会上作了发言。

十月十四日

北师大召开五万人批判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李雪峰到会检查。市委机关召开大会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华北局工作组池必卿作检查。

十月十五日 — 十七日

各单位狠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立夫发言》遭到彻底批判。谭逃走南下。首都革命师生又开始到全国大串联，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推向全国。

十月十六日

晚，聂元梓发表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上揪李雪峰、张承先，下扫

反动路线在北大的影响，哪有就扫到哪。“校文革有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揭发后再检查。”

聂的讲话有两种不同的反映，大部分同学认为“上揪下扫”是今后的方向，而《井冈山》等单位则发表声明，认为聂“耍阴谋，放暗箭，”“想中间溜掉”，“扼杀大辩论”，并认为聂过去对大串联支持不够，现在又“放任自流”，是“大阴谋”。

哲四赵丰田贴出《拨开迷雾万千重，试看庐山真面目》的大字报。

赵画了一条北大运动发展的曲线，把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与张承先工作组等同起来，说校文革执行了一条反动路线，并解释道：

“当我说错误路线时，我是把它列入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范围里的，但同时又不是把所有的错误路线看成半斤八两，没有一点区别”，“不是那种最严重的典型，但这种情况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又具有典型性，又是一种典型。但这种类型更难发现，也比较难于辨认它的性质，需要充分的辩论，才有可能使群众的大多数认识它的路线性质。每个为此奋斗的人，都得做下这种精神准备”。

大字报大谈必然偶然，看不到这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深远革命意义，看不到这份“北京公社的宣言”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及其制定者的宣战书。毛主席的伟大，在于发现了它，支持了它，高度评价了它，赋予它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宣言的使命。

大字报说“6·1”、“8·4”中央发表意见太早，北大群众锻炼得不够，给北大运动的曲折埋下了“伏线”，“先天不足”；加上些左派“绝大部分”成了工作组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忠诚执行者（主要是认识问题——赵原注）他们“害怕群众”，“害怕清理”，“清理工作组走了过场”，是“折衷主义”。这样，必不可免的，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的是一条反动路线。

这张大字报是这方面意见的典型作品。

十月十八日

主席第七次接见了外地革命师生，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十月十九日

在东操场一些战斗组织召开纪念“六·一八”，庆祝“八·一八”大会，发扬“六·一八”精神，批判北大原工作组反动路线（原工作组副组长张德华被揪

来)斗争陆平、彭珮云,庆祝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十月中旬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两条路线斗争更加深入。

十月二十日

晚,我校邀请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同志在庆祝《毛泽东选集》发行十五周年大会上做精彩报告。

十月二十二日

晚,聂元梓作广播讲话,谈在革命师生大量外出串联的情况下,怎样开展下段工作。说,要揪李雪峰,扫就要首先扫我,扫校文革,各级文革。并指出,不搞批判,陆平还未斗倒,时机一成熟就有人翻案。

十月二十五日

下午,《北京公社》、《东方红公社》等组织发起召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五周年大会”。我校,首都兄弟院校,外地革命师生数万人参加了大会,发扬“五·二五”革命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大字报作者之一宋一秀在大会上发了言。会上,我校,首都院校,外地革命师生代表也发了言。大会庄严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聂元梓应邀讲了话。

《红旗兵团》(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主办)创刊号发表了中文系《起宏图》《顶风船》大字报《欢呼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北大的胜利》,较系统地回顾了北大几个月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并指出“五·二五大字报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

有人反对纪念“五·二五”,说这就是“突出聂元梓”。《红联军》的《向日葵》以“也来纪念‘五·二五’五周年”为副题发表《聂元梓在两条路线大辩论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大字报,说聂元梓“上揪下扫”是错误的,聂元梓让北大革命师生走得空空的是“值得深思的”,等等。

哲四《风雷激》发表《再论要彻底革命,不要改良派》与《岿然不动》辩论,它进一步具体地谈聂元梓同志是如何由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缺乏认识,逐步脱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的。”

十月二十七日

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大壮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士气。

十月二十九日

连日我校掀起一个揭发批判李雪峰的高潮。下午，《新北大捍卫毛泽东路线联络站》所属单位发起召开了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原工作组副组长武振声、张德华揪来了。市委的吴德、刘建勋和聂元梓等出席大会，“五·四”广场，校园有十多万革命师生参加了大会。李雪峰到会作了检查，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检查极不深刻。

哲三《岿然不动》发表《聂元梓等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兼驳哲四“风雷激”战斗队“要彻底革命，不要改良派”一文》。大字报以事实说明聂元梓等过去的斗争主要矛头指向陆平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根本要夺权，而不是改良。并兼驳了聂元梓和张承先斗黑帮没有什么不同的谬论，指出我们是真斗不是假斗，也不像有的高校里为了转移群众揪工作组反动路线的视线。并以事实驳斥了聂元梓是名利主义者的谬论。同时，亦指出聂元梓工作存在的缺点，没有抓紧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彻底解放过去受打击的群众等。

十月三十日

经济系李志远《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问世（本月中旬杨勋有一张进一步阐述聂元梓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路线，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路线的大字报，李志远的大字报就是盖在这张大字报上面）李志远把聂元梓和陆平、张承先都说成了“革命的同路人”，有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取得政权后受到北大具有“深厚基础”的“习惯势力”，“个人主义，奴隶主义，折衷主义，形而上学，墨守陈规，害怕革命变动——”“这种习惯势力，是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总是倾向于保守，改良”，——的包围，于是就必然地实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李志远这套理论，公然为陆平，张承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开脱。就语句来说，也十分露骨，最明显的有“（陆平）的确乘革命之势，给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陆平这个为党派来的老干部，怎么竟把北大变成顽固的堡垒，又怎么从一个反对资本主义勇士的领导人，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党派陆平来北大是为了改变北大党委过去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力的情况而加强党委领导的”等等。

李志远心目中的群众是陆平的“忠臣顺民”，无知和愚蠢，他们都是充塞着“个人主义，奴隶主义，折衷主义，形而上学，墨守陈规，害怕革命变动”，也

就是李所谓的“社会基础”。

李志远这套理论是杨勋那套观点的更“抽象”，更“理论化”，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大暴露，这张大字报选择在十一月一日前两天发表不是偶然的。

十月三十一日

首都召开纪念文化革命伟大旗手鲁迅大会，北大有部分革命师生参加。一些革命师生表示，要纪念先驱鲁迅，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上揪下扫，彻底批判反动路线。

十一月一日

下午，由于两派观点不同（指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我校同时召开两个大会，一个是《新北大捍卫毛泽东路线联络站》等所属单位继续十月二十九日的纪念毛主席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五周年，继续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东操场），聂元梓参加了这个大会讲了话，郑重宣布校文革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诞生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北京大学校文革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建议把“六·一”作为校庆纪念日。我校及外地革命师生参加了大会。

另一个是新北大《井冈山》、《红联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新北大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等开的“纪念‘六·一’五周年”大会（五四操场）。“倡议书”说要“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北大以聂元梓为代表的革委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批判李雪峰发言短而空，重点是批判聂元梓及校筹委、校文革执行了“一条新的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这条路线的特点是改良主义”。经济系杨勋坐在主席台中央。这是一个大方向错误的大会。

会议中途，由于“五四”广场各地革命师生往东操场过来，“五四”会场主席团派来两个人，不经过主席团就要拉聂元梓过去。会议出现了争论和混乱现象。聂元梓说过不过去要经过大会主席团，说要站在这个无产阶级讲台上讲话。聂元梓针对李志远大字报还念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主席语录。聂元梓的讲话与《新北大》第二期刊载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谈不上“篡改”，是一个充满革命精神，坚持了原则立场的讲话。

十一月二日

两位中学生来信，红联军等抄成大字报贴出，题为《北大聂元梓为首校文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说聂元梓在十一月一日大会上“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反动路线的大暴露。红旗兵团发表《在中学生公开信的背后是什么》给予驳斥。

十一月五日

《新北大》二十期出版，报导了十一月一日两个大会情况，并刊登了聂元梓讲话。本期还发表了夏天兵《论机会主义的真面目——兼评杨勋十月六日的大字报》一文。

十一月六日

《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站》对十一月一日东操场大会录音带磁带问题发表声明，提出井冈山等久借录音带不还，多次交涉无效，种种建议遭到拒绝，令人怀疑它失去了原始意义，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十一月七日

红联军《浪滔天》发表评校刊二十期刊登聂元梓的讲话是《可耻的行径，卑劣的勾当》说校刊篡改了聂的讲话，为砸《新北大》临时编辑部作舆论准备。

十一月八日

聂元梓等十一人贴《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要揪出上海叛徒常溪萍“有恃无恐”的根子。学校出现了一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及其制定者的大字报。聂元梓等大字报亦有人感到刺眼，极力贬低，后来还有人说聂元梓和“赫鲁晓夫如出一辙”，“唱修调”。

《红旗兵团》发表《决战的五个月，胜利的五个月》，系统地阐述了我校五个月来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向失败。

《井冈山》等召开串连会，杨勋主持，她说：“他们不搞，我们组织来搞”。

十一月十二日

基于《新北大》编辑部人员外出串连，校文革在十月下旬决定由一些系串联起来组成临时编辑部，由校文革派委员领导。《井冈山》等五个单位发表《告北大和全国革命同志书》，要砸烂《新北大》临时编辑部。捏造了三大罪状：

1) “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压制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意见”，“成了校

文革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

2) 说二十期刊登聂元梓讲话是经过“精心删改的伪造品”，去掉了聂元梓“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恶毒词句”，是聂元梓执行反动路线的“遮羞布”；

3) “坚持种种罪恶行为”，“死不悔改”。

最后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违反“十六条”的行为作掩饰。他们印成传单，大量印发。

下午五时许，《红联军》、《井冈山》等单位二十来人破窗砸门，闯入校刊临时编辑部，毫不讲理，非法禁闭工作人员，截断电话线，翻箱倒柜，撕碎公共书籍，档案材料撒了一地，校刊十九、二十期乱扔一地，任人践踏……最后还抱走公章和钥匙和私人的来访日记和钥匙。由于混乱把“毛主席万岁”的标语贴在沙发上，在挂有主席像的墙上写着“造反有理”，“打倒奴隶主义”等口号。

晚上，毁坏现场不少本校和外地革命师生参观，有两种不同意见。大多数认为这是违反十六条的。亦有人不敢谈十六条，强词夺理，扬言“如不‘乱’，还要砸”、“砸出一个新北大来”。但有人指出：“民不畏砸，奈何以砸惧之”，“想挑动群众围攻他们，只显得他们无能而已。”

经济系《延安》战斗团写文章揭发砸的经过，揭露经济系某些搞“地下工作”的教员暗暗叫好，噉噉喳喳，煽阴风。

十一月十三日

晚，历史系《延安》战斗队发起串连会，与会者回顾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多月来的斗争，认为我校从校筹委会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阵线越来越分明，形式越来越隐蔽，“砸”就是反动路线没有出路的表现。典型的《红野牛》的“上诉书”大字报反映了《红联军》等的处境和心理，总想找出一个像样的聂元梓“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例子，想有人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与会者认为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大方向对头，路线正确，但缺点错误不少，有的甚至很严重，必须揭发批判，认为“上揪下扫”是正确的，揪李雪峰是正确的，以后还得注意“下扫”，肃清反动资产阶级路线在我校的影响。与会者表示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十一月十四日

支持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的《东风兵团》宣告在斗争中诞生，迅速投入战斗。

十一月十五日

《红旗兵团》大字报《井冈山、红联军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干了些什么？》揭露了他们不批判李雪峰为代表的反动路线，而千方百计想把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打成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行为。

十一月十七日

《新北大》二十一期发表该刊临时编辑部再次发表声明：（一）校刊十八——二十期“方向是正确的，旗帜是鲜明的”，《井冈山》等少数人竟把聂元梓和李雪峰放在同等被批判的地位，这是方向性的错误，原则性的错误，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二）对《井冈山》等“肆意践踏十六条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

（三）要求迅速交还抢去的东西，派人清理档案，如有损毁，由他们“负完全责任”。最后，并希望广大师生员工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严肃批评，把报办得更好。

十一月十八日

《北京公社》郑卫东（09支队）针对哲四赵丰田大字报，贴出《拨开迷雾万千重，再看庐山真面目》，给予反驳。

十一月十九日

中文系《东方红》战斗小组贴出了《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大字报。基本观点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路线正确，校文革坚决抵制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在叫骂声中成长”，是“作为其它学校的假文革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指出“五·二五”大字报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总攻的号角”，“毛的矛头不但指向陆平、宋硕，而且直指向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

大字报说：“校文革是历史的新生事物，是我们群众自己的组织”，工作组刚刚赶走，就有人抛出一篇《目前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有人发表《红旗宣言》，说什么“校系文革基本由中间力量把持，是和平过渡的产物”，说什么“陆平黑帮的社会基础还没有破”——“实际上就是指学生干部”。大字报指出，这是明显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当时有人提出上揪李雪峰，这些人就“跳出来”，“横加指责，”扬言要“起群雄，灭阴风”，很多同学热情地要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

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我校的反映，聂元梓坚决抵制了这条反动路线，把矛头“指向黑帮”，而不是“对准同学”。

大字报回顾八月十五日校筹委会刚成立二十二天左右，就有人抓住它的一些缺点，大叫《高举十六条，改组筹委会》，提出论据与上述同。另外，还有人竟贴出《这样的官，我们不做》和自我罢官声明，这些人却同时宣布成立“红卫兵”明白与校文革对抗。

大字报尖锐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失掉政权，死不甘心，“总是要夺权”，“夺权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而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坚决抵制了反动路线，“在叫骂声中成长”。

大字报最后“认为要把群众和幕后指挥者严格区分开来，我们怀疑有人在暗中破坏！”“和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人，99%是革命的好同志”。

下午，经济系新北大红卫兵尖刀连突然发出通令，“勒令”经济系系文革立即滚蛋。

十一月二十一日

《新北大》二十一期出版，发表文章批判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期对《井冈山》等砸毁校刊临时编辑部这一严重违反“十六条”的行为，对北大运动方向和办报方向发表评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表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新北大》必须站在革命路线的正确立场上。

晚，校文革广播了对《井冈山》，《红联军》等五个单位向校文革常委会提出一些要求的答复（十七日常委通过）如下：

（一）“砸《新北大》临时编辑部的行为，是极端错误，是违反十六条的，是践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题字的《新北大》的政治错误”；

（二）“《新北大》十八至二十期，大方向是正确的。它有力地配合校文革宣传了毛泽东思想，配合了当前的实际斗争”；

（三）《井冈山》等单位“11月14日晚上向常委会提出的一些要求，有的已经答复，有的像广播台单独为他们广播，什么《新北大》在复刊时（事实上校刊并没停刊），每期出刊前要给他们协商等，这是不合理的。”

（四）“物资供应”，“对待各路红卫兵，战斗队，我们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仍然是这样！少数派也不例外。而且，以前

我们对少数派还作了适当的照顾。这是有目共睹的。”

(五) “乘砸《新北大》临时编辑部之机，抢走了部分资料、《新北大》编辑部公章、公家和私人的钥匙、私人的笔记本等物，这是极端错误的”。《井冈山》等主要负责人“必须立即送还原物，并派人与校文革有关方面人员，一起清理档案”。

(六) 《井冈山》等主要负责人，必须对这件事，“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公开检讨，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均由他们负责”。

上午经济系文革会议研究“解散”问题，最后经李志远同意，宣布解散系文革。下午各方面联席会议成立临时小组全权负责系里的工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

因为经济系的问题，晚上，校文革传达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新市委有关平反的一系列指示，校文革副主任（负责平反工作）杨学琪作广播讲话，要全校革命师生很好学习中央关于平反的指示。（经济系问题《延安》战斗团已印发有关材料）

十一月二十三日

《井冈山》等单位下午在大饭厅向各地革命师生介绍自己的观点，称自己是“革命造反派”，说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介绍会到最后有听众三十一人。

《井冈山》等一直沿着揪聂元梓的方向走，打标语战，拉宣传车到天安门广场宣传。……

十一月二十五日

《再论聂元梓等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哲四《岿然不动》）长篇大字报贴出，更系统地批驳了一些错误观点，进一步阐述了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的是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十一月二十六日

深夜十二时许，新北大红卫兵尖刀连等单位闯进四院，砸破旁门玻璃，进入经济系档案室，撬开文件柜，抢走部分档案材料和一些黑材料。尖刀连他们的人建议把黑材料放进档案柜以便封存，他们单方面封的文件柜和档案室的门，并单

方面声明“谁也不能启封之”，晚上，自己又来砸了。

砸档案室时，经济系彭澎闻声出来要保护国家机密，受到斥骂，拖拉，和限制人身自由。彭澎想去常委会受到纠缠。有一个同志还被他们反锁在屋子里，出不来。

新北大红卫兵尖刀连单方面声明解散了临时小组。

十一月二十七日

经济系彭澎、肖必凡等对尖刀连昨晚粗暴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革命中保护国家档案和机密的规定的行动，对限制他们人身自由的做法表示严重抗议，彭澎同时贴出了肇事的过程。《延安》等各单位对此事表示强烈抗议。彭澎，《延安》战斗队还指出这件事与李志远有关。经济系公章给尖刀连偷走。

《延安》战斗团发表声明，鉴于对方不来参加检查档案丢失情况，二十八日上午邀请各兵团等代表来参观现场，当众检查丢失情况，遗失一切材料应由尖刀连等单位负责。

校广播台晚上对哲学楼前和“五四”操场丢失喇叭、变压器一事发表通告。紧接着“红色造反广播台”大播《红色尖刀连》声明，说抢的都是黑材料，并扬言要公开，又声明他们偷来的广播器材不准别人拆走。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午，经济系《延安》战斗团邀来校文革、《红旗兵团》、《北京公社》、《东风兵团》等方面代表检查现场档案丢失情况。下午继续。事后各方面代表发表了检查工作公报。对尖刀连等单位破坏中央关于保护档案、机密的规定和违反十六条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十一月三十日

“红色造反广播台”广播抢来的“部分黑材料”（该台语）——张承先工作组时等人写的《夺权记》，系的有关简报，他们并把这些材料抄出公布于大饭厅。

这几天，串联同学陆续返校。辩论双方都召开串连会，介绍近两个月斗争情况。 ■

〈完〉

——东风兵团，初稿，于十二月初
大事记〈十月初——十一月底〉

东风兵团编印

新北大斧头印刷厂承印

页数 9 印数 001—500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稿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北大

(本资料原为油印件，2015年1月上旬章铎将其录入为电子版。特此说明)

附件二：

搬开聂元梓 北大才能乱

物二(三)路远、周闯

由于过去的原因，聂元梓是个当然左派。但是事务是发展变化的。试看聂元梓同志上台以后，长达两个多月，干出了几件好事来？

(一) 筹委会斗陆平，完全是为了给北大贴金(实则抹黑)。当时就是特别注意文斗为全国立个样子来。结果文斗变成温斗，后果不佳，只好又要选举。以后几次斗陆平，绝大多数同志是当听众的，学生这个主力军成了助威军。发言是指定，冗长烦杂，士气低落，纳入了聂元梓的轨道。人民的地位、作用安在？

(二) 选举选举，选不出好班子来。此处浪费青春，外地正好革命，走了！那么多人发了紧急呼吁，要聂元梓等注意。可是他们却置之不理，不抓事务苗头，忙于事务。三千人跑了，陶铸的信才来。聂元梓同志何其迂也！

(三) 红五类早在“八·一八”以前就提出组织起来。在红五类子弟的大会上，聂元梓同志的讲话支支吾吾，避开组织问题，一再强调绝大多数同学，真是胆小鬼！看今日之北大，团结好了吗？

(四) 聂元梓等同志上台之后，各种宣传机器把哲学系左派突出。特别是在展览会里，一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二没有突出革命群众，那么到底突出了谁？北大校刊上聂元梓等七人的“只有无私 才能无畏”一文，我们认为没有突出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难道五二五大字报不是由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一六指示的指导才写出来的吗？同志，当心名利思想的侵蚀！

(五) 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结论。但群众只要这个结论就行了吗？同学中有部分人要坚持辩论，聂元梓同志你为什么不让展开辩论以肃清工作组影响？当初批判工作组，你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后来怎么想通的？你是否知道群众想通了没有？

(六) 自吹自擂选举校文革是什么巴黎公社全面选举。真的如此吗？学生占多数吗？改换候选人还没充分介绍、有的候选人本班都不知道，如此等等能算充分酝酿吗？人走了三千余，还说是全面选举，岂不给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抹黑吗？

(七) 中央首长说：北大不一定去参加劳动。《红旗》发表社论，各校辩论两条路线轰轰烈烈，可是北大学生下乡，仍是冷冷清清，这是为什么？在每一个关头，必然有两派意见，聂元梓却总是压制一派反对的意见，起了捂盖子的作用。有聂元梓在上面压，北大的矛盾就露不出来。还有一部分人，谁给聂元梓贴大字报，就有人打着保护左派，爱护左派的旗帜压人，竟有故意贴住人家给聂元梓贴的大字报。我们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形势是新北大能否诞生的关键。不能用庸人的观点，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

聂元梓对那些压制民主的现象不加以制止。她还文过饰非，不承认错误。所谓支持抗大战斗队下工厂农村，纯系谎话。筹委会工作报告，大部分同志都不同意，还提了尖锐意见，可是却不了了之。我们劝聂元梓同志这次自动退位，当一名普通的积极分子。对革命，对本人无不好处加倍！！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1966年10月6日

附件三：

北大文化革命又处在关键时刻

——兼评聂元梓同志八月五日的广播讲话

经济系 杨勋

对于当前北大运动的这种严重落后状况，广大革命群众早已极为不满，他们

迫切要求打破北大的沉闷空气，改变这种冷落的局面。

但是一些人十分欣赏这种死气沉沉的“平稳”状态，满足于走在兄弟院校的前面。其实，这是盲目地自我陶醉而已！

对于校筹委和校文革的种种错误，广大革命群众从八月中旬以来，就不断地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和宝贵意见。但是，校筹委和校文革没有认真对待这些批评和意见，采取了不理不采的官僚主义态度，甚至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压制和打击。两个半月来，校筹委和校文革日益走向机关化、行政化和官僚化，逐渐丧失其作为文化革命运动中的群众组织的特色，越来越脱离了大多数革命群众。

为什么在张承先工作组撤走以后北大的运动仍然处于落后的状态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校筹委和校文革没有真正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执行了一条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的错误路线。

在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从始至终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斗争。张承先工作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突出的典型。在张承先工作组撤走以后，校筹委并没有按照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张承先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清除这条反动路线对北大运动的影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校筹委采取了走过场的作法，结果，直到现在，张承先右倾机会主义阴魂仍然顽固地附着在一些人的身上，张承先工作组统治时期的一些错误做法，经过改头换面，继续被保留下来，一些曾经遭受张承先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好同志没有得到解放，一些被张承先工作组欺骗、利用的好同志至今没有真正觉醒。这就是两个多月来北大文化革命运动不能健康深入开展的根源所在。

在进一步分析这个错误根源时，人们不能不想到聂元梓同志在担任筹委会主任之后所作的一次重要的广播讲话。八月五日，聂元梓同志代表筹委会做了《对当前工作的几点建议》的广播讲话。这是一个具有方向性错误的讲话，它给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埋下了病根。在这个讲话中，聂元梓同志虽然也引用了一些革命词句，但它的基础是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的，折衷主义的，调和主义的，7月底到8月初，聂元梓同志所作的关于张承先工作组问题的其它几次讲话和她在筹委会上的多次发言，其基调也是如此，错误甚至更明显。

这里我不打算全面剖析这个讲话，而仅就其中的某些内容进行简略的评论。

聂元梓在这个讲话中说：“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借着清理工作组错误的机会，想把真正的革命左派（指某些追随过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志——引者注）一棍子打死。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必须与这种错误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聂元梓同志把这种个别现象当成了当时的主要危险。并向全校师生员工大声疾呼，要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斗争”。

难道聂元梓同志要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那种现象真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吗？不是，绝对不是！当时的主要危险是许多人害怕清理，抵制清理，从而有可能使清理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走过场。对于这个真正的主要危险，聂元梓同志在讲话中不仅没有加以强调，提醒大家注意防止，相反，她还给清理工作规定了不少的框框，限制对张承先错误的清理。

在这个讲话中，聂元梓同志说：“筹委会号召全体北大的师生员工，要顾大体，识大局，加强团结，一致对敌，决不能斤斤计较内部分歧，而忘记了主要打击目标，使运动迷失方向，走向邪路。”很明显，聂元梓同志是想用折衷主义、调和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张承先工作组的错误所引起的严重分歧，她大讲团结，而绝口不谈达到团结一致的前提（分清是非）和方法（批评或斗争）。在当时清理工作还没有认真开展起来的情况下，讲这样一些话，是完全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也是违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分清是非、加强团结的指示的。既然当时的主要分歧是由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引起的，因此，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就必须首先弄清在张承先工作组问题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弄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一致对敌”。

聂元梓同志8月5日的广播讲话给当时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泼了一瓢冷水，广大革命群众要求彻底清算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性被压下去了。在同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得不到承认。一些曾经被张承先工作组压制和迫害的同志，在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解放了十天之后，又重新背上了包袱。一些积极抵制过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坚决要求彻底清算这条反动路线的同志，受到了非难、指责和攻击。个别跟张承先跟得很紧、思想意识严重不纯的人，在没有吸取教训的情况下，继续在文化革命组织中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从而阻碍运动的健康发展。总之，聂元梓同志的8月5日的讲话以后，由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重新发动起来

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又逐渐冷却了下去。

聂元梓同志8月5日的讲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讲话。两个多月来，校筹委和校革委会的工作大体上是在这个讲话的基本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此，认真研究和分析这个讲话，对于从根本上认识两个多月来北大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聂元梓同志的这个讲话，校筹委会曾进行过讨论，在讨论时，我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没有被采纳。8月4日晚，在批判张承先的万人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给张承先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作了结论，在大会结束之前，我再一次建议聂元梓同志根据大会上康生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的精神修改广播讲话的内容，但没有被采纳，由于我坚持要彻底清算张承先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北大运动的影响，并揭发了经济系工作组在张承先的指挥下把经四一部分同学错误地打成牛鬼蛇神的严重罪行，从八月初开始，我被当作“假左派”，并遭到了将近两个月的有组织有领导的围攻。这场围攻在校文革选举前夕达到了最高潮，因为有人一心要把我从校文革组织中排挤出去。在校文革选举期间有人以“杨勋是什么人”为题写了长篇大字报，论证“以聂元梓为首的正确路线战胜了以杨勋为首的错误路线”。校筹委会常委委员×××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说：经济系杨勋是假左派，校筹委派人把她搞下去。校文革常委委员×××由于同意我8月23日大字报的观点，在选校文革委员和常委委员时竟遭到追查，质问他同杨勋有什么关系。

两个多月过去了。斗争陆平、彭珮云的大会开了若干次，校文革也选出来了，展览会也办起来了，论战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也没有了，从表面上看似乎北大的运动一切都令人满意了，北大好像真的成了向其他单位传授先进经验的“橱窗”了。但是，北大的运动究竟搞得怎么样呢？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么？校文革选举真的符合十六条中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么？运动真正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了么？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形成了么？

两个多月过去了。由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矛盾解决了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北大运动的影响清除了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彻底贯彻了么？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矛盾是不能掩盖也不能调和的。革命者决不能害怕矛盾，

回避矛盾。革命者的责任在于：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革命运动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矛盾。

《红旗》第13期社论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

为了彻底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北大运动的影响，排除阻力，改变北大运动的落后局面，胜利地完成斗、批、改的任务，目前有必要就北大文化革命运动的根本路线问题展开一场大辩论。

我们希望校文革和聂元梓同志立即行动起来积极组织这场大辩论。

关心北大文化大革命命运的同志们，让我们勇敢地投入这场大辩论吧！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倒奴隶主义！

打倒折衷主义！

坚决执行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1966.10.6

（这张大字报原载1966年10月8日《新北大》第三版）

附件四：

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虎山行战斗团

近几天来，一向平静的北大突然大动起来了，大号的标语到处皆是，又开大会又开小会又发表声明又喊呼吁，好一派“繁华”景象，就连一向沉默的北大文革常委也活跃起来，首当其冲地于十二月七日深夜十时许，出人意外地在《擦亮眼睛，投入战斗》的乐曲声中，广播了一个《紧急呼吁》，接着北京大学红卫兵更出人意外地号召于11：15去五四操场集合，准备游行，接着又于十一月八日，开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大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大学文革常委会的呼吁中说：“最近在北京，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

刮起了一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和翻案的妖风，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指向坚持和毛主席站在一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于是乎，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北京大学红卫兵，东风兵团，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等等战斗团体争先恐后的大施恐吓战术，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呀，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呀，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呀，等等，好不吓人！而吓人最甚者，骂声最狠且最高的要数井冈山红卫兵及所属战斗团，导演这出吓人战术最积极最卖力的也是井冈山红卫兵及其所属战斗团。

难道形势果真如此严重吗？难道真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吗？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你相信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吗？你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人民中的威望，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吗？你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的吗？

那么，目前在许多单位展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辩论，就绝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之关键！目前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主流是健康的，好得很！每一个确定革命观点的人，每一个仔细分析现存形势及几个月来文化革命发展规律，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应该跟着人瞎说，胡乱指责当前的运动，而是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斗争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并站在他们的前头，引导他们，使他们获得结果，获得胜利！

革命的同志们，都不可忘记张承先对“六·一八”形势估计的教训！

然而，北大众炮如一地认为当前炮轰中央文革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抓住大辩论中的一些皮毛小事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场严肃的关系文化大革命能否深入发展的争论归结到几个人身上……如此等等。

他们说，这次提倡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多是“保”工作组的，这不是反扑是什么？革命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随时检验每个人，而每一个组织也都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潮流之

中。过去，井冈山曾代表着革命势力，炮轰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文革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不是已滑到相反的方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充当围剿这次大辩论的急先锋了吗？而过去那些所谓“保”字号同志，由于少数派夺权后反过来受到压迫发现了问题起来造反，代表革命势力，不也是很可理解的，怎能说成是“反扑”？

文化革命中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一直在进行着，并将继续进行下去。十六条指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怎能说人家对中央文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呢？那末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林彪同志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革命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

如果说，当前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话，那末，这种反扑，在北大就更明显，北大文革常委的莫明其妙的紧急呼吁，北京大学红卫兵组织的示威游行，几个组织联合召开的声讨誓师大会，以及井冈山的“砸狗头”“混蛋”的叫骂声和“上海市的保皇派滚蛋”的岂有此理的大标语，不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你们不相信群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运动不明真相、毫无思想准备的群众，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令人遗憾的是，以反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而挨骂最多的井冈山红卫兵及所属战斗团也极尽挑动群众斗群众之能事，变本加厉地执行从三司批发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每个革命者应从中吸取教训。

北大必须大乱！然而几天来，北大一直是一边倒！难道大家的意见果真如此统一吗？我们应该彻底解放思想，真正发扬林彪同志所指出的大民主，敢想敢说，不要怕大风大浪，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里发展起来的，还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不敢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吗？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趋群众运动之势，为了文化大革命更深

入地开展起来，我们就要炮轰中央文革小组！

愿中央文革小组开门整风，深入群众，听取批评意见，愿全国人民对几个月的运动来个大检查、大总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雨过天晴，望东方已见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

同志：举起你的双手吧！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五：

聂元梓同志在纪念“六·一”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

今天是六月一日的五周年。“六·一”是一个光辉的日子，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节日。五个月前的今天，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北大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给以极高的评价，并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六·一”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日子，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的日子，也是新北大诞生的日子。

我向全体革命师生员工提议：将“六·一”这个光辉的日子定为我校校庆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我们要重温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历史，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五个月的革命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激烈的。革命实践一再证实毛主席的教导，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习惯势力。

《红旗》十三期社论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我们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按照十六条和林彪同志在庆祝我国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彻底批判以

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在当前如果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个目标，都是不正确的，而且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

我郑重宣布：北京大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诞生的，它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北京大学校文革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但这些缺点和错误，即便有些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也是在革命前进道路上所产生的，是在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因此，我们衷心欢迎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严格的批评，那怕是尖锐的、激烈的。

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有的同志也在召开“纪念‘六·一’五周年大会”，“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他们的大会主要是“批判北大以聂元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给他们的大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不能去参加他们的会，因为我们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们在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欢迎同志们提出严格的批评，但我们决不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登上被批判的讲台。

在任何时候，我们要坚定地相信毛主席，坚定地相信群众，同时要正确地估计自己。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每个革命同志，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要坚持原则，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考验，遇到暂时的挫折，不消极，不埋怨。我们要有迎着困难前进的勇气，要有坚持斗争取得胜利的信心，在斗争的烈火中经受考验，炼出一付无产阶级钢筋铁骨，炼出一付无产阶级硬骨头。

同志们，战友们，文化革命阻力越大，我们越要斗争。只要毛泽东思想真理在手，任何严峻的阶级斗争我们都不怕。我们敢于向旧世界宣战，敢于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集团进行斗争，敢于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历史将会宣判他们可耻的下场，这就是历史的真理！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答疑】

答郑实的质疑

胡宗式

2014年10月31日《记忆》第120期刊登了郑实先生所写《北大武斗期间死亡事件真相探究——兼对胡宗式提出几点质疑》一文。阅后，感到郑文所提的问题，在我的文章中都有说明。也许我说的还不够明确，现对两个疑问作如下答复。

第一，关于凶手问题

我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写了《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一文，并刊登在《记忆》第114期上。刺死殷文杰的凶手就是两个人。郑实说“更为诡异的是，在《北京大学纪事》中的记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高玉堂的名字，只有杨恭谦的名字。”《北京大学纪事》的编撰和我毫无关系，因此要搞清这个问题，我认为郑实应该去问《北京大学纪事》的主编王效挺等。

郑文说：“…只有杨恭谦的名字。他毕业时被顺利分配，直到10多年后的1978年11月8日，校党委才向北京市委报送了《关于法办杀人凶手杨恭谦的请示报告》”。1970年杨恭谦所在单位的两个人到我工作的单位外调，要我作证是杨恭谦扎了第一枪，我说我没看清，只是“有可能”。外调材料是那两个人写的，写的是“可能”，我签了字。可见1970年杨恭谦所在单位，已经着手处理此事了。似乎郑先生忘掉了自己文章里说过的话：“1972年9月2日……杨恭谦（刺死殷文杰的主凶），不再重新处理。”这句话意味着郑先生知道杨恭谦先前已经处理过，并不是“逍遥法外十年”。至于北大十年后为什么再提此事，我怎么会知道？

郑实还质疑“还有谁参与了刺杀殷文杰？”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下面的这件事情：《记忆》第114期（2014年5月31日）刊登了我所写的《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被刺致死事件》一文后，有一位史正先生在我的博客的读者评论中，连续

留下4段文字（2014年8月14日），标题为“谁是杀害殷文杰的元凶——质问胡宗式”。史正说胡宗式“参与刺杀殷文杰”，“工军宣队专案组，不仅调查了胡宗式，调查了杨恭谦、高玉堂，而且还调查了参与其中的一个女同学，身在现场的胡宗式，替公社执笔撰写杀人报告的胡宗式，为何对她隐瞒不报呢？”

我至今也不知道还有第三个行凶者，我一直实话实说。而史先生说参与者有一个女同学，郑先生也问还有谁参与刺杀。看来，应该是由我来质疑郑先生和史先生了。如果说真有，那既然知道还有凶手，当年工军宣队进校后你们为何不去举报，后来也不到检察院检举？是说你们不負責任还是说你们隐瞒真相呢？如果你们举报过，那么就应该去检举接受你们举报的人在包庇凶手，不必过了40多年再来问我。如果实际上你们也知道没有第三名凶手，那你们这样故弄玄虚要干什么？

第二，“为什么舍近求远，把殷文杰送到721医院？”

首先，送721医院不是我决定的。你真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建议去找黄元庄。

离北大最近的医院是海淀医院，质问“为什么舍近求远”，就应当质问为什么不去海淀医院。郑实的文章说：“樊立勤，就是被送到北医三院，被抢救过来的。”我查了相关资料，郑实的这种说法不确切。《陈一谔回忆录》有如下文字：

3月底，在北京卫戍区调解下，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交换俘虏，^①樊立勤被交换出来，奄奄一息地抬到海淀医院。^②谢佐平跑来告诉我：“樊立勤不行了，医院已放弃治疗。”我们赶到海淀医院，黄仕强摇摇头说：“不好办了！”我说：“我三嫂周羨梅是北医三院的主治医生，快送那儿去吧！”谢佐平的老朋友孙勇刚，背起昏迷的樊立勤就跑。我找到三嫂说：“樊立勤是江青赞赏的革命小将，请务必救活他。”她急忙带我去找了驻院工宣队长。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樊立勤终于出现了生机。我再三向医院工宣队和三嫂表示了感谢。樊立勤出院后又到北京地质学院疗养了4个多月，直到8月中军宣队进北大才返校。我原来和

^① 孙月才（曾任新北大公社一把手）在他的《悲歌一曲 文革十年日记》一书中记载，这次交换俘虏的时间是1968年3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 关于樊立勤是否交换俘虏时出来的，我还看到另外一个版本：舒声先生在《北大文革中的“异端”人物》一文中写道：“1968年3月27日上午10时许，聂元梓派人在校园里强行绑架抓走了樊立勤。”“3月29日，樊立勤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审讯他的人怕出人命，把他扔在学生浴室附近，被东方红公社的同伴发现，送到北医三院抢救。”

他并不熟，因他坚决反工作组、反聂元梓，我对他的硬骨头很钦佩。（112页）

但我对他许多过于极端的痞子想法和厚黑作法并不苟同。后来，几个熟知他的朋友都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红卫兵”。其实，我何尝不知，他贴康生大字报，是认为康生左的还不够；他还很欣赏林彪“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的鬼话。“六四”后，他为谄媚邓家，竟丧失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昧心地对我进行攻击，让人恶心地看到了极权制度下的痞子嘴脸和人性扭曲。^①（113页）

北大文革的亲历者，绝大多数都已年逾古稀，有些已离开人世。在我们还没有老年痴呆时，为后人留下可靠的历史记录，是不容推辞的责任和义务。我愿和一切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另外，“数学系白玉林校友指正：胡宗式文章里的高玉堂应为郭玉堂，是数学系65级的学生，钢一连的成员，毕业后分配山西，任灵石一中教师，已于2007年去世，终年62岁，同事和学生对他反映都不错。白说他是贫苦家庭出身，并非坏人，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造成悲剧。”这是张从校友最近在我的博客上的留言。对于白玉林校友和张从校友的指正，我表示衷心地感谢。■

^① 《陈一谔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陈一谔，1940年生，陕西三原县人，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和中文系；因写了一篇三万字的《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点意见》，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于1965年10月底受到系统批判。1969年~1978年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期间，对中国的经济、教育、社会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上世纪80年代，陈一谔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推动者，组建并主持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后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中方主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89年“六四”事件后，他离开了中国。

【评论】

17日还是19日？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北京大学纪事》作者造假又一实例**

胡宗式

“一月夺权”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它起源与上海，经毛主席、党中央的推而广之，很快遍及全国。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781~782页这样写道：

一、“全面夺权”导致“天下大乱”**上海“一月夺权”**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在这种导向下，发生了使全国性动乱进一步升级的上海“一月夺权”事件。

.....

上海“一月夺权”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1月8日，他在谈及《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时提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吹到北京，中央号召北京群众组织夺权。聂元梓在周总理18日讲话的号召下，19日成立了夺权指挥部，北大开始参加夺权行动。北大动态报1967年1月20日第35期有如下报导：

在接见工人组织座谈会上，周总理、陈伯达同志讲话（摘录）（时间1967.1.18

地点：人大礼堂小礼堂（清华井冈山口头传达）

总理说：今天30多个单位夺了北京新市委的权，我们祝贺他们的胜利。今后的任务首先吸收一些主要的工厂、吸收更多的职工帮助加强力量。综合性大学要负起主要责任，如北大、清华、师大……要负起主要责任，而不是派几个人参加几次会议的问题。首先是监督他们的工作，不行的就撤他们的职。参加的就要加强，没有参加的就要参加。既然前进就不允许半途而废。党中央、文革、解放军都帮助你们。要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任务。我们信任你们，你们同时也应信任我们。这样大的事情，随时都要和我们取得联系，24小时内我们都要听电话的。

同期动态报还有两则消息：

昨晚聂元梓同志，在我校广播讲话中指出：当前夺权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是文化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我校已组成夺权指挥部。下阶段大部分人军训，一部分人搞社会夺权，一部分人宣传反经济主义。

最新消息*我校“红教工”、“挺进”今天（应为19日——引者注）下午接管了高教部、教育部，并发表了一号通报。（见图一）

孙蓬一1977年1月3日给我的来信中写到：“我历来不太赞成去管校外的事，因为我觉得社会上的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没有能力将那么复杂的事情短期内判断清楚，搞不好容易上当。当若干学校积极干预校外问题时，有的人在我面前抱怨北大，正如北航、清华说我们“窝囊”。不过，我还是有我的看法。一月份夺权时，若不是总理点了我们的名，我也是不主张我们去参与这种事的。总理指示后，我是坚决响应的，连夜传达、动员、组织，我觉得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我们责无旁贷。”

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首都红旗联合总部宣传部1967年出版的“大字报汇编”登载了1967年1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王力、戚本禹同志在接见首都工矿企业造反派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接见结束时间是19日凌晨。由此可见，北大组成夺权指挥部是在总理18日讲话之后立即组成的，

时间是1月19日。

图一是北大动态报第35期照相版。聂元梓的讲话是19日讲的，报道的稿件也是19日写的，所以原稿有“今晚”字样。报纸是20日出版，由于编辑的疏忽，有了“今晚”的错误，油印后才发现有误，随后用手工作了改正，改为“昨晚”。去高教部、教育部夺权的日期也有同样错误，但没有注意将其改正。



图一 北大动态报第35期

聂元梓组建夺权指挥部的确切日期是19日。但40年后，北大官方出版的《北京大学纪事》却把夺权指挥部成立的日期说成17日。一字之差有何玄机？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第771页这样写道：

1月17日 聂元梓根据江、陈授意，组成校文革夺权指挥部，孙蓬一、徐运朴等任夺权指挥部指挥。

《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没有说江、陈是何时、怎样授意的。我查阅了相关文献，从1月8日毛泽东对上海夺权的批示到1月17日，中央首长谈北大，只

有陈伯达、江青1月16日接见聂元梓、孙蓬一时有讲话。这次讲话没有谈夺权的事情，倒是江青留下一句名句：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第771页，在1月17日夺权词条的上方有如下记载：

1月16日 江青召见聂元梓、孙蓬一，陈伯达说：“王任重很坏，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讲了孔繁、杨克明很多好话，讲了聂元梓很多坏话。”江青对聂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说“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显然，江、陈的这次谈话并未提及夺权之事。如果有的话，《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是绝对不会将其漏掉的。

17日和19日，一字之差，《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回避了周总理18日的讲话，把北大的夺权行动和总理的指示割裂开来。其实这是徒劳的，不会因为有没有陈伯达、江青关于夺权问题的讲话，就能改变一月夺权是毛泽东领导、周总理下令给北京高校的这个事实。联系到《北京大学纪事》不记载1967年聂元梓领导的北京市反对潘梓年、吴传启的斗争（即反对王力、关锋的斗争），不记载1967年4月13日孙蓬一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凡此种种，只能暴露《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无视历史事实，顽固坚持北大的文革就是保聂和反聂的斗争、反聂即革命的指导思想。

在文革中北大保总理，是有目共睹的，是有大量事实为依据的。但是，从1970年开始的清查5·16运动，到粉碎四人帮，直至2008年《北京大学纪事》再版，北大当局一直想把聂元梓说成是反总理的。更有甚者，2008年版的《北京大学纪事》还杜撰出聂元梓反总理的内容。本文所说的事，只不过证明《北京大学纪事》编者，又一次想瞒天过海罢了。

附件：

中央首长1967年元月18日接见

（说明：笔者没有查到中央首长1967年元月18日接见的讲话全文。手头有3种文献：（1）《毛主席的新北大》北大火车头编辑部（1967.11出版），有总理的讲话。（2）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首都红旗联合总部宣传部 1967年

出版的“大字报汇编”，登载了1967年元月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王力、戚本禹同志在接见首都工矿企业造反派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有总理和江青的讲话。（3）北大《动态报》刊登的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在1月18日的讲话摘要，谈夺权问题。为了方便读者，笔者将上述三个文件综合，发表于后，只供参考。）

中央首长召集工矿企业部分代表座谈会讲话（1967年1月18日 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参加的有总理、陈伯达、江青、王力、戚本禹）

陈伯达：“阶级斗争不是平坦的，会有很多曲折，无产阶级夺了权，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要反夺权，所以精神上要有准备，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夺完，阶级敌人也不甘心它的灭亡。许多同志经得起战争考验，但经不起糖衣炮弹。我们现在可以抛开那些不能为人民服务的人，凡不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都要斗垮它！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方向。……敌人不投降，就让它灭亡！”

江青：“刚进城的时候是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接管，是夺权，而现在是革命人民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切权利归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人民。”

江青同志还谈了几个具体问题：（1）建工部革命造反总部说：中央文革在他们那里成立了党组，中央没有这个指示！（2）广州消息说：我到广州去，他们就组织欢迎我，去了20多万人，农民也进城。……你们要辟谣。（3）毛主席哪儿也没去。（4）有个叫张**的，冒充是我的秘书，到东北活动，成立了红卫兵东北活动站……东北的人回去可以辟谣，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

总理：我同意江青同志和陈伯达同志的意见。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得到了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情况。现在北京的外地工人等串联的大约有一百万左右。铁道部已经夺了反党分子吕正操的权，我们一定要夺他们的权，一夺到底。我们今天的会开得很有必要，昨天开了大中学校的座谈会，着重谈了夺权问题。今天开这个会也是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目前主要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里面关键问题是夺权斗争。如果哪个单位还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掌握，那么我们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因此一定要夺权。刚才江青同志讲了，我们十几年前夺权，是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扫到大海里去啦。简单

说来，这是打江山。我们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在大中城市实行军事管制。这次不同了，这次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七年了，但是还存在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领导权必须夺过来。怎样夺？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自己动手来夺领导权。这个权上面是毛主席授给我们的，下面是群众授给我们的。北京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央各个系统的，一种是市委的。中央各系统的，一种是党的各部，现在已经开始夺权了。政府各个系统是按各系统来进行的，比如政法系统，外交部系统等八个系统。铁道部应该把铁道系统的大专院校造反派联合起来，这样形成一股力量进行夺权。以内因为主，吸收外部力量来解决。另一方面就是北京市的，今天晚上已经开始有三十多个单位到北京市委去夺权了，已经进驻北京市委大楼，我们要庆祝他们的胜利。夺权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能陷到事物当中去。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不是派一小部分人去的问题，也不是就开几个大会的问题，要起主要作用。具体的工作要由原单位的人员来做好，我们去监督他们，只许他们好好地工作。夺权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家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把政权夺过来。我们上面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领导，下面有广大群众，夺权就一定能胜利。

北京最近出现了一些全国性组织，像什么“中国红旗军”、“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都是反动组织，我们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现在有些人要翻过去的一切案，象五七年的右派也要翻案了，右派怎么能翻案呢？四清工作队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搞的是好的，个别是搞错了的。不是过去的一切都错了，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国复员军人不要成立全国性组织，这个中央已有指示。写大字报不写姓名，今天署名这个战斗队，明天署名那个战斗队，我们不赞成这样做。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是光明磊落、正大光明的，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的座谈会仅仅是开始，今后还要开。 ■

【资料】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中的聂元梓和孙蓬一^①

章铎（抄录）

1966年

6月1日 晚8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抄录者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764页写道：毛主席的批示是：“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2日

同日，首都各报全文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则以《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污蔑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煽动“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彻底摧毁”。

6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社论说：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这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

6月18日 一些人在38楼等处设了“斗鬼台”，四处抓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用墨汁涂面、拳打脚踢，甚至发生严重污辱女干部女教师的流氓行为，直到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等赶到现场制止，才逐渐结束。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今日共有69人被抓到“斗鬼台”等处批斗。工作组并抓

^① 抄录者注：以斜体字表示的部分，是2008年版新增内容。

出四个打人最凶和侮辱女同志的人，其中一人是校外混进来的。

7月12日

▲下午，地球物理学系陈必陶等五个学生贴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

7月17日 凌晨1点半，吴德电话通知张承先，传达李雪峰指示：对“六一八”事件要做新估计。

7月19日

▲聂元梓在哲学系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聂元梓讲话前，从康生处了解到上边对工作组态度的变化。

晚11时，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的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于是，在学生和教职工中围绕工作组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7月21日 校园内贴出了不少大字报，要求聂元梓对于她反工作组的演说澄清事实，回答问题。

7月22日 江青、陈伯达等以调查文化革命的名义，来校看大字报，向师生发表讲话，并撇开工作组召开座谈会，个别召见聂元梓等人，鼓动他们起来反工作组，赶工作组。

7月27日 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向全校提出“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的倡议。聂经哲学系推选为代表。

7月28日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8月1日 中央召开十一届一中全会，聂元梓、杨克明、张恩慈因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笼中有功，奉命列席全会。

8月3日或4日 江青邀聂元梓坐江的车到她住处（钓鱼台）吃饭，她说聂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是她亲自送给毛主席的。她向聂透露机密、攻击刘少奇。江要聂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我，我随时可以接见你”。聂事后认为：这是“表明她把我当做了她的嫡系和心腹，才对我透露最高机密。”

8月13日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指示，并经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筹委会同意，北京市委驻北大工作组全体人员于今天撤离北大，集中到市委党校整训。

8月17日 毛泽东主席题《新北大》三个字。

8月18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8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的社论。说：“不把旧北大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倒、打碎，新北大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要经过大斗争、大批判、大改革”，“把每个学校、每个单位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堡垒”。

8月30日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出席。聂元梓致开幕词。

9月11日 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

9月21日 北大红卫兵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聂元梓指定孙蓬一等为负责人。

10月6日

▲路远、周闯贴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说聂上台“没有干几件好事”，劝其“自动退位，当普通积极分子，对革命，对本人不无好处”。

10月7日 校文革发表《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参加大辩论》的决定。

10月8日 《新北大》刊发《欢呼这场大辩论》的社论。提出就校文革执行了什么样的路线“是非”开展路线大辩论。同期发表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一种肯定校文革的，一种则认为“校文革压制群众，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新北大》刊登杨勋的文章《新北大文化大革命又处于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8月5日的广播讲话》。

10月20—21日 校文革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提出“常委首先要整风”。聂元梓主张“要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辩论进行到底”。孔繁等多个常委则表示要外出串联，“不要参加整风”。校文革常委内部两派矛盾表面化。

10月24日 在校文革常委会上，聂元梓提议：因五个常委外出串联，经部分常委研究，提名陈影、姜同光、侯汉清、孙蓬一、王海忱等参加常委会会议，加强常委集体领导。会议同意聂元梓的意见。聂还决定由孙蓬一管全校的运动、组织和作战。

10月31日 校文革决定改组以杨克明为主编的《新北大》编辑部，改由

刘国政、陈影负责。

11月1日 校文革集会，纪念“六一”（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之日）五周年，继续批判李雪峰。聂元梓在会上建议将“六一”作为北大校庆日。

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六个组织也举行了“纪念六一”五周年群众大会。着重批判聂元梓、校文革执行了“一条新的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发表倡议书，号召批判聂元梓、校文革的这条“反动路线”。

11月6日 孙蓬一派人带领红旗兵团二十多人到上海揪斗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

11月8日 本月初，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开始商量起草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今日，由孙蓬一修改、定稿，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11月12日 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红联军等五个造反组织砸抄了《新北大》编辑部，同时贴出《告北大和全国革命同志书——砸烂〈新北大〉编辑部》的大字报。它说：“《新北大》登出的聂元梓纪念‘六一’五周年讲话是‘伪造品’，删掉了聂元梓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言辞，充当了聂元梓执行资反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同）的遮羞布。”

11月13日 晚9时许，中央文革王任重（应为王广宇，参见《问史求信集》闫长贵 王广宇著 第479~481页——抄录者注）给聂元梓打电话说：江青很关心你，很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今晚让你离开家，带上你认为最重要的材料，住到另一个地方去。聂元梓当晚就由中央文革办事组派车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住。

11月16日 江青召集陈伯达、姚文元、王力等在她的住处策划派聂元梓到上海造反。江青说：“叫聂元梓到上海去一趟……再从北京选一些左派去，支持上海造反派，造成造反派的声势，冲破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统治”。

▲晚，江青找聂元梓密谈，江说：“王任重是国民党派来的”（王当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分管大专院校），“你不要追随他”。又说：“你到上海去串联，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上海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前，陈（丕显）、曹（荻秋）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又执行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毛主席指示一贯采取抵制态度”。还说：“张春桥和陈、曹是有斗争的”，“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都是一窝黑帮”，“他们互相是有联系的，和邓小平也是有联系的……”。聂说，江青还举北大社教“煽动我对彭真、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常溪萍的不满”，我就“怀着满腔激情决定立即到上海去串联”。（见聂元梓1980年12月写的材料。）

11月17日 王力找聂元梓谈话，根据江青谈话精神，对聂作了具体安排：到上海和中央文革记者站甄××建立联系，有什么材料也送甄××，有什么问题要请示中央文革也经过他。

11月18日 上午，聂元梓从花园街中央文革记者站回校，召开校文革常委会，传达江青讲话要点，又把王力讲话向跟随她一起去上海的孙蓬一等人作了传达。当天晚上即上了火车去上海。“我们商量的办法是：一、通过和上海华东师大联合批判常溪萍（注：常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兼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副校长，北大社教中曾任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坚决抵制队党委书记的极左作法，并向总书记邓小平揭发队党委书记的错误），打开缺口，揭发批判曹荻秋（上海市长）。二、通过上海师大与上海市各群众组织联系，积极参加各种批判大会和活动，亮明我们的观点：上海问题严重。文化大革命前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应该打倒曹荻秋。三、把北大在上海串联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把我们的观点传达给他们，在上海串联中进行宣传”。（见聂元梓1980年12月写的材料。）

11月19日 聂元梓按江青的授意，带领孙蓬一等人于当日到达上海，住华东师大。当晚聂召开北大在沪串连人员会议。他们宣布了“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计划。他们还计划把常溪萍同志打成“北大社教的叛徒”、“暗藏的反革命黑帮”进行批斗、迫害。聂说：中央文革派我来上海的目的，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组织发动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央解决上海问题作调查研究。上海市委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反动堡垒。并提出红旗兵团在沪串连人员组成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1月21日

▲聂元梓带领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成员三十多人围攻上海市长曹

获秋，质问他为什么保常溪萍。说曹是保皇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上海一些大专院校造反派开会欢迎聂元梓，聂在会上发言说：“上海市委是反动堡垒，烂掉了”、“常溪萍是大叛徒”，“曹获秋、陈丕显是刘、邓的人，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上海市委的反符合斗争大方向”。

11月22日 聂元梓等经过几天串联后，参加“上三司”的成立大会，会上批斗上海市领导人曹获秋、杨西光及聂元梓要求增加的常溪萍等。大会给聂元梓、孙蓬一佩戴纪念章，聂元梓在大会上发言，基调是“打倒曹获秋”。大会上给常溪萍挂了牌子，会后给剃了阴阳头。

11月23日 聂元梓到南京参加六省一市的万人大会，煽动群众揭发、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24日 上海市群众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欢迎“第一张大字报”作者大会，聂元梓在大会上讲话，攻击曹获秋等上海领导同志，聂并宣布：“不打倒曹获秋不回北京！”此后上海群众才普遍提“打倒曹获秋”的口号。

11月25日 上海市各造反派组织召开全市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大会，聂和孙蓬一、李醒尘商量好内容，由李醒尘在大会上发言，内容同24日聂在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一样，攻击上海市委和曹获秋等领导同志。

11月27日 聂元梓与张春桥密谈。聂元梓一到上海即向中央文革记者站甄××表示：张春桥如来上海，我想同他谈谈。27日甄××去车接聂元梓与张春桥密谈。张春桥说：“上海工人是发动起来了，学生运动不行，希望你们起到很好的作用”。当聂汇报在群众大会上她提出了“打倒曹获秋”的口号时，张春桥说：“对，应该这么提，是时候了”，并对北大与上海师大联合批判常溪萍很满意。张说：“常溪萍受曹获秋重用”。还说：“许多人只知道曹获秋的问题，不知道陈丕显的问题，其实市委许多重大问题都是陈丕显决定的，上海市委的问题要揭透，必须把陈丕显的问题提出来。不要以为陈丕显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许多老革命不是也修了吗？陈丕显已经腐化了，修了”。（聂元梓回来后，把张春桥的讲话，立即向孙蓬一等作了传达。聂、孙等根据张春桥指示，不但重申了“不打倒曹获秋不回北京的誓言”，还提出“揭发批判曹获秋的后台——陈丕显”。他们还按照张春桥的旨意，选了有影响的四个工厂并和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商量，“如何联合起来，批判曹获秋，造上海市委的反”。聂还

向市委要了一辆宣传车，在大街上到处宣传江青、张春桥的谈话精神，攻击诬陷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发动了批判、颠覆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新高潮”。)

12月16日 聂元梓离沪回校。她在沪期间曾召集“上海工总司”、“上三司”等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要他们“召开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她还鼓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打进市委机关去”。聂离沪时，留下孙蓬一等人继续进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造反活动。

▲聂元梓回到北京，向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作了汇报。张春桥等人认为“聂元梓实现了江青的布置，巩固和扩大了安亭事件的成果，冲破了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统治，造成了王洪文这一派造反派的优势……”。

12月18日 聂元梓回京前与孙蓬一策划了继续“打常”的问题，18日孙蓬一在上海市文化广场斗争常溪萍大会上，诬陷常“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使常溪萍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和人身侮辱。

12月19—21日 聂元梓在反击“十二月黑风”的口号下，开始批斗、抓捕“井冈山”、“红联军”的重要成员。从12月19日至21日，红旗兵团等组织日夜开会，批斗“井”、“红”成员杨炳章、乔兼武。

12月27日 留沪继续造反的孙蓬一与华东师大的一些人组织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进驻上海市委，参与了上海第一次大武斗——康平路事件，写了《陈（丕显，上海市委书记）曹（曹荻秋，上海市长）六大罪状》的大字报。

▲聂元梓控制的北大红卫兵与清华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等联合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孙蓬一在上海组织并带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兵团”进驻中共上海市委。该兵团炮制出《刘记陈、曹六大罪状》的材料，四处张贴、散发，攻击、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2月29日 校文革与中央党校、中宣部等四单位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大会。刘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中共北京市委书

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等人被揪上台“示众”。

12月 康生针对校内有人反对校文革、聂元梓实行高压政策的情况，说：“就是要使反动言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们感到有压力，压得好”。江青也对聂元梓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

1967年

1月1日 《新北大》刊登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说要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反动逆流”，号召“立即行动”，从对立面组织中抓“反革命分子”，揪“反革命的幕后指挥”。说，“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这期间他们抓捕了杨炳章、乔兼武和经济系教师、校文革委员杨勋等人，押送公安部。

1月4日 校文革联合49个单位召开声讨刘、邓“反党”罪行大会，并通过《告全国人民书》说：“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派，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要把刘、邓彻底批倒、批垮、批臭”。

1月5—8日 校文革联合“北航红旗”等21个院校的造反组织走上街头，举行“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连续示威游行。

1月10日 《新北大》刊发李清昆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的发言：《孔繁、杨克明同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其中说：“江青说孔繁、杨克明的活动就是刘邓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同日，《新北大》发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社论说，要弄清孔、杨“的反动面目，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说“反革命分子杨勋”等和“虎山行”、“井冈山”、“红联军”中的“某些领导人充当了急先锋”。“他们围攻校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谁要坚持反革命，就要对他实行专政”。

1月16日 陈伯达、江青召见聂元梓、孙蓬一。陈伯达说：“王任重很坏，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讲了孔繁、杨克明很多好话，讲了聂元梓很多坏话。”江青对聂元梓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说“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1月17日 聂元梓根据江、陈授意，组成校文革夺权指挥部，孙蓬一、徐运朴等任夺权指挥部指挥。

1月18日 聂元梓召开各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聂提出，“要立即组织人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和北京市人委各部进行夺权。要赶快行动，去晚了就不成了”。会后连夜出动大批人到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夺权。其中去高教部夺权的人员进行了“四抄”：抄了一些处以上干部的家；抄了各办公室；抄了“黑材料”；抄回了各部门的大印。

1月22日 江青在部分高校造反派代表座谈会上支持聂元梓，批评蒯大富（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司令）。她说：“我们对你（蒯），自己的战友，希望你成长得更快。可是你对北大的‘虎山行’、‘红联军’、‘井冈山’的态度是错误的”。“有人诽谤聂元梓同志，聂元梓有缺点、错误……但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是共患难的战友，是和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在此期间，北京市的造反派在“一月夺权”中，开始分裂成两大派：“天派”和“地派”。）

1月23日 《新北大》发表攻击朱德的文章《把大军阀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来》。

1月24—26日 高教部“延安公社”和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大批人到北大校内示威游行、刷标语，反对聂元梓。“北大红旗兵团”则提出：“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

1月27日 聂元梓同清华大学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简称“北京公社”）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通过、发表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书》，说要把北京市的“党权、政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还通过、发表了《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的倡议书》，提出通过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巴黎公社式的大夺权”。

2月3日 聂元梓接见“作协造反团”负责人，决定“中国作协造反团”和“新北大”联合组织批判班子，批判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从而批判朱德委员长。

2月14日 《新北大》刊登校文革2月10日发出的《重要通告》，宣布2月7日校文革扩大会议改组校文革常委会的决定。《通告》说：孔繁、杨克明“操纵群众，造谣中伤”，“使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处于内外夹攻的困难境地”。“对这样的坏家伙，我们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从校文革里清除出去”（同时将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聂孟民赶出常委会）。

2月15日 “新北大公社”召开成立大会。聂元梓代表校文革表示最热烈祝贺。“公社”总部主要成员先后有：夏剑豸、卢平、刘冲、孙月才、李长啸等。

2月22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聂元梓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

3月3日 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大字报揭出了聂元梓涂抹录音带的事，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聂的不满。校文革常委徐运朴、侯汉清支持郭的大字报，与聂、孙分裂。

3月18日 聂元梓召开红代会核心组会议，决定发动十万人游行，打倒谭震林。聂当场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得到戚本禹批准。

3月27日 陈伯达、戚本禹以座谈教改为名来到北大。他们对社会上有人贴大字报炮轰、攻击周总理时说：“现在提到炮打某某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都不可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陈还说：“炮轰一个人不能简单地说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会后，聂元梓、孙蓬一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传达，并将讲话印出来，广为散发。同时连续开串连会，说“要揪大个的”，要“揪出新的黑线”。聂、孙并派出许多战斗队，到国务院各部、委，收集情况，整理负责同志的材料。）

3月 孙蓬一提升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

4月11—12日 “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到北大游行示威，呼喊“聂元梓从‘首都红代会’滚出去”（聂元梓是核心组组长），“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等口号。

4月12日 校文革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孙蓬一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要“迎头痛击（地派）资产阶级反动逆流”，“目前的这场斗争，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江山落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我们的口号只能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并指责对方（地派）是“真正的摘桃派”。

4月14日 康生给聂元梓写信，说：“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彭真、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结果，看到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

聂元梓依照康生的信，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

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数力系学生杨建铎任队长，生物系学生师春生为副队长。该兵团选定的成员均送“康办”备案。（该兵团后来携“康办”介绍信派人到全国二十多个城市查阅敌伪档案，提审在押人员，凭犯人的口供，搜集编造老干部的材料，制造了十多起大案、冤案。其中在“百人专案”中，将叶剑英按照中共决定，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的三百多名我党干部，全说成是叛徒；搞北京地下党一案，诬陷刘仁。他们搜集编造彭真的材料，为康生陷害彭真提供了“依据”。）该战斗队成员逐步达到125人。

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任革委会副主任。

▲聂元梓于20日前后，授意“第二战斗队”队长杨建铎派人调查胡仁奎等人的“特务”问题，借以诬陷彭真。随后，专案组长写出了《关于胡仁奎、李伦和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关系的调查报告》，经聂元梓、孙蓬一上报康生。康批转中央专案办公室“彭真专案组”。

5月16日 校文革召开批斗翦伯赞大会。孙蓬一在会上说：“不管你是翦伯赞也罢，‘潘伯赞’、‘吴伯赞’也罢，如果不投降，就叫你们灭亡”。

5月17日 孙蓬一写信向康生报告“第二战斗队”组建结果及工作开展情况，请示如何上送材料。康在信上批示：“可直接送”。

▲“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成立（“五一六公社”加入），樊立勤为发起人。

5月22日 “红旗飘”成立，发表反聂元梓校文革宣言。该组织原名“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本年2月份即开始活动，其核心组成员有牛辉林等五人。

5月 聂元梓派高云鹏去汉中653分校，以驻汉中分校宣传队负责人身份负责分校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5日 晚，陈伯达来校，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这个讲话的地点是人民大会堂而非北大——抄录者注）

6月6日 “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

▲聂元梓贴出《掌握斗争大方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说要“抓主要矛盾，狠抓大方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

6月7日 “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

6月8日 “新北大北京公社”成立。郭罗基参加组织并在成立会上讲话。

▲“新北大公社联合战斗团（简称联战团）”成立。

▲陈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6月9日 由“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发起串连，成立了“六六串连会”。该会发表八点声明，说：“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

6月13日 “新北大福州联络站”自本月7日开始至13日参与反军（福建军区）绝食活动。

6月中旬 “新北大公社铁锤兵团”、“新北大公社工人兵团”相继成立。

6月20日 高云鹏在汉中分校组织北大、西安交大在汉中的部分学生，以查抄黑材料为名，抢走汉中地区公安处1966年5月至年底的公文、会议记录等，造成失密。

6月22日 《新北大》发表《批评左派、必须爱护左派——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社论。社论批驳对立派提出的北大“要全面夺权”、进行“二次革命”、“整风解决不了新北大的问题”等反对聂和校文革的口号，并说“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6月28日 金××对聂元梓说：“关于抗缅问题，我国政府的抗议太软弱了，我们文艺界准备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发表声明，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暴行，戚本禹要我请你参加我们的大会并讲话”。聂答应去，并表示要“红代会”的同志也去。接着戚本禹又找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戚本禹说：“我们的政府调子不高，总理作事总是愿意很稳重，谨慎的，未免有点太保守了。你们要到外交部找领导同志，提出意见和批评，所以一定要召开一个群众大会，要用群众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强烈的抗议。……会后要分两路游行，一路要到缅甸大使馆，一路要到外交部，也让外交部领导（意指总理——聂元梓原注）看看群众的革命义愤，仅仅发表这样的声明够不够，和当前的革命形势相比怎么样？”聂元梓和

北大红卫兵参加了大会。会后聂元梓按照戚本禹的指示，率领红卫兵到了外交部。

6月 “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称：“1967年初，曾加入‘湘江风雷’并任该组织挺进支队北京支队负责人的许××，要我们把陷害总理的‘0007密令’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我请示了聂元梓，她说：你们把它送到中央文革记者那里。由聂元梓电话联系，我到44楼三楼向中央文革记者上交了这份材料。”

“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争队”队长赵建文称：“1967年春，从民族学院那里知道‘0007密令’问题后，怀疑总理和这个问题有关。聂元梓、孙蓬一把我们找去做了汇报，决定到湖南调查。”聂元梓说：“你们可以去，湖南是有这个密令，他们还来北京上告过，你们去了可以找一下‘湘江风雷’和‘高司’。也可以了解一下湖南军区的情况。聂还议论湖南军区是总理支持的。他们让去湖南的矛头是指向总理的。”

“新北大除隐患战斗队”副队长潘国华称：“5月上旬，赵建文对我讲：陈××（原无线电系学生）和孙蓬一联系，他在长沙调查了‘0007密令’的情况，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孙蓬一让我找陈把材料取回来整理上报。回来后，赵建文对我说：聂元梓、孙蓬一要赶紧把材料整理上报。赵建文还说：要赶紧把‘0007’案件材料整理上报，总理就是有错误，以后中央不保总理时，整理的材料就是反总理的材料”。

赵建文的说法是：“关于‘0007密令’的问题，是聂元梓、孙蓬一及他们的后台向中央进攻的炮弹。1967年6月5日以后，陈伯达的秘书到北大来，我向他做了汇报、送了材料。除了‘除隐患’自己之外，姜同光告诉我聂元梓也给了陈伯达。”

聂元梓说：“赵建文对我说：材料中涉及到总理，这些材料将来都是很有用的。可以从正反中发现问题。我给想了一个办法，这些材料，现在正反的都在一起混着，就这样摆着不要加以整理，也看不出来是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记住，要研究问题的时候，从正反中可以分析，需要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整理出来。赵还说，‘他已经复印了学部的材料，里面有总理的……’。我说赵建文出了一个好主意，就这样办吧。这就形成了我们在反王、关、戚的掩护下也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的指导思想和作法。‘除隐患’后期的工作，

就是做的这些工作，只有赵建文是积极参与制定这个指导思想并是具体执行的人。‘除隐患’后来整理的一、二、三批材料，是指向总理的。”

7月1日

▲周培源等134名干部发表《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内称：“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7月10日 陈伯达发表讲话说：“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聂元梓不要打倒，还要她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对孙蓬一也不要打倒，‘要一看二帮’。”并对反对聂元梓的人说：“你们用我的话攻击聂元梓，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红旗飘”、“北京公社”等组织查抄校文革的二组驻地南阁和燕南园63号，抄出两批由二组整的“黑材料”。

7月12日 “新北大红旗飘”、“新北大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联合编辑的《新北大报》创刊号出版，发表题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长文章和《欢呼〈新北大报〉的诞生——代发刊词》。《代发刊词》批判《新北大》校刊，说它已堕落为扶植保守派、围剿革命派的驯服喉舌，堕落为孙蓬一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说“它鼓吹‘上揪下扫’，把‘井’、‘红’打成反动组织，残酷镇压……革命群众”。

▲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召开全校“痛击刘少奇猖狂反扑大会”，聂元梓作动员报告，把刘少奇的检查称为“反攻倒算的宣言书”。会上发布“动员令”，动员群众积极投入“批判刘少奇的新高潮中”。（13日，校文革邀请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来校介绍他们“揪刘经验”。）

7月18日 聂元梓召开“打倒刘少奇、揪斗邓小平、彭真誓师大会”。聂元梓的讲话、崔××及“新北大公社”等头头的发言对刘、邓、彭进行攻击。大会决定全校革命师生于19日进城游行，勒令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邓小平、彭真到北大低头认罪。

7月19日 聂元梓等动员全校师生员工，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队伍先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开誓师大会，聂元梓讲话，表示“揪斗刘少奇的决心”，然后

派“刺刀见红战斗队”等红卫兵队伍开到中南海西门，参加“揪刘火线”（此后，聂元梓还多次去慰问北大学生，并代表红代会慰问其他高校学生、鼓动他们“一定要把刘少奇揪出来，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7月28日

▲聂元梓召开“红代会”核心组全体会议，会上蒯大富传达戚本禹指示，要在8月5日揪出刘少奇。揪刘指挥部还提出了揪刘计划。蒯大富说：“兵分两路总可以揪出来，一路去找总理，一路直接到刘少奇住的地方去揪他。”聂元梓说：“我同意兵分两路”。聂元梓还传达了陈伯达、戚本禹在北大的讲话（即：“炮轰一个人不能简单地说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都不可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

7月

▲本月2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新北大公社”外联组组长刘××到聂元梓家，刘说：“如果总理不批准把刘少奇揪出来，建工‘八一’绝食饿死了群众，责任就是总理的了”，聂元梓说：“就是批准揪出来，群众七斗八斗，斗死了，或者给藏起来，刘少奇人没了，责任还是他（总理）的。”刘说：“这么说，批准也好，不批准也好，总理倒台是一定的了。”聂元梓说：“一定倒了。”

▲本月末，聂元梓同孙蓬一等核心骨干一起议论：聂元梓说：“在揪刘问题上反映出来，是旧政府机关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对旧政府机构中的人员要轰一轰。……在揪刘火线的问题上，总理的意见是保守的，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戚本禹是执行中央文革精神的。”孙蓬一说：“现在应对旧政府机构中的死角打扫打扫了，现在的形势很清楚，就是总理同中央文革的矛盾，我们还是紧跟陈伯达，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王××说：“就是一干到底，就是听陈伯达的。”

8月3日 聂元梓召集“新北大公社”头头们开会，传达红代会的决定，说8月5日要兵分两路，一路去找总理，一路去揪刘少奇，我们北大一定要两路都参加，要有面对面斗争的决心。会上决定北大再增派三百人到中南海“揪刘火线”。

8月12日 新北大“八一兵团”和石家庄“揪斗崔田民联络站”共二百余人冲进铁道兵司令部大院，抄家、抓人，并撬开保密文件柜，抢走2409份文件，造成严重失密。

▲“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总部勤务员牛辉林在校内作形势报告，说“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要“揪军内一小撮”。此前，武汉“七二〇”事件后，聂元梓曾多次发表演说，说：“现在揪军内一小撮成为运动的大方向”。“运动要深入发展，就必须从揪地方上的走资派，深入到揪军内一小撮”，“批带枪的刘邓路线”。两派均向各地派出联络站，与当地造反组织联合，“揪军内一小撮”。

8月17日 “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和“北京公社”、“红旗飘”等五个造反派组织（简称井、红、团、零、飘）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今天在“五四”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称：“我们革命造反派走过了光辉战斗的一年，大造了陆平、彭珮云的反，大造了张承先坏工作组的反，大造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今天我们又大造了聂元梓、孙蓬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实行了革命大联合……去完成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历史任务”。周培源、李醒尘出席大会并讲话。同日，周培源参加井冈山兵团。第一届总勤务员（核心组）有周培源、侯汉清、郭罗基、牛辉林、徐运朴等11人。第一任核心组组长周培源，副组长牛辉林、徐运朴、陈醒迈、侯汉清（后改为牛辉林任组长。）“清华大学井冈山”司令蒯大富等来信祝贺。“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校内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

8月19日 高云鹏在汉中653分校参与汉中地区造反派组织的活动，支持抄砸当地公安处，插手武斗。今日发生炸毁（汉中运输公司）大楼的“八一九”事件，造成29人死亡，30余人受伤。

9月1日 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说：“（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群众是好的”。

9月7日 《新北大报》编辑部发表《粉碎二月复辟逆流，恢复“井”、“红”本来面目》的文章和“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彻底为“井冈山”（红卫兵）、“红联军”、“红旗赤卫队”、“红教联”翻案的严正声明》，批判校文革“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

9月16日 江青讲话说，“北大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

▲《新北大报》发表《热烈欢呼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原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彻底翻案的公告》。这份8月17日发出的《公告》说：

“新北大井冈山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造反组织，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期还发表署名井冈松的题为《谁敢否定我们的大方向》的文章。说：“聂、孙是镇压造反派的老手”，“去年镇压‘井’、‘红’……今天老佛爷（指聂元梓）又做起镇压‘井冈山兵团’的黄粱美梦来了”。文章还批评聂元梓、孙蓬一说：“你们残酷地打击一大片，数百人的劳改队迟迟不散，剥夺数百名干部、教员的选举权”。

10月22日 《新北大》发表题为《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社论。社论说“这个原则就是承认校文革红色政权的领导”，说“一支反革命黑手”，“利用左派犯错误的机会”，“一手炮制了井冈山兵团”，破坏了北大的“革命大联合”。

10月25日 校文革决定今天正式“开学闹革命”，由聂元梓、崔雄昆、王茂湘等人组成开学闹革命领导小组。

11月18日 “井冈山兵团”召开大会，批判、揭发聂元梓、孙蓬一在干部问题上执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23日 北京市革委会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转发市革委会值班常委《关于北京大学1966年毕业分配领导小组问题》的指示：“中央和市革委会认为，新北大校文革是权力机构，同意新北大在校文革领导下，吸收井冈山（兵团）及未参加组织的同志参加各级分配小组”。

11月28日 “井冈山兵团”召开“坚决支持革命干部孔繁、杨克明同志杀上革命第一线大会”。

11月30日 《新北大》报道：30日全校举行党员大会，由聂元梓宣布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的建立和正式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决定。报道说，11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吴德指示聂元梓可以立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由谢富治、吴德审批了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名单，其中：组长聂元梓，副组长孙蓬一、崔雄昆。

12月7日 《新北大报》刊登哲学系62级部分党员12月1日写的《不许聂、孙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严正声明》，对聂元梓“不经党员酝酿、讨论”突然成立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提出“抗议”。

12月20日 《新北大》发表《北大井冈山是极右和极“左”思潮的混合物》的文章。说，其“要害是充当关（锋）、王（力）、林（杰）反党集团的马

前卒……企图在北大复辟资本主义”。

1968年

1月16日 校文革办公室《通告》称：“井冈山兵团”的“暴徒抢夺校文革大印”。

1月17日 “新北大公社”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揪斗原“红旗飘战斗队”成员谢世扬，说谢是“现行反革命”，加以逮捕。

2月13日 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校文革《通告》说：“军队到北大是帮助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现按系统、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的身份出国。

2月15日 《新北大》编辑部发表文章：《不许为关（锋）王（力）林（杰）反党集团招魂，评地质（学院）〈东方红报〉的〈大事记〉》。同时发表《春风浩荡进北大》的社论，内称：“承认校文革、支持校文革、加强新北大的红色政权是实现大联合的原则问题”。

2月27日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单独接见“井冈山兵团”代表，说：（一）北大校文革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这是中央承认的，你们井冈山要承认校文革；（二）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在文化革命中是有过贡献的，校文革要承认它，不承认是不行的；（三）北大要成立革委会，如何成立，你们回去双方协商解决；（四）解放军支左不支派……。

▲“井冈山兵团”在校内提出：“要革委会，不要派文革”的口号。

2月29日 校文革向中央文革报送224号《情况反映》，说李钟奇、丁国钰28日（按：应为27日）的讲话“引起了混乱”，“新北大公社战士对此十分不满”。认为：“（一）校文革是中央肯定的，无须进行讨论；（二）李副司令员、丁国钰会不会讲这样的话？是不是井冈山兵团造谣？”

3月20日 深夜，“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组织群

众到北大校园内示威游行，“井冈山兵团”也内应组织示威。游行示威中高喊：“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等口号。

3月22日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发出《通缉孙蓬一的通缉令》。

3月23日

▲“新人大公社”等六个造反组织到北京市革委会示威，并发表《声明》：“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

3月24日 北京农业大学一些造反组织到北大示威，宣传“打倒聂元梓”。

3月25日 “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聚集北大，进行反聂、孙游行，并发生武斗。

同日，地院、农大、北邮等院校红卫兵开广播车到北大校内宣传，声援北大“井冈山兵团”。

▲晚，谢富治、吴德、丁国钰赶到北大讲话，制止武斗，要求“所有外校外地学生一律退出北京大学”。“到北大来武斗是错误的”，“打倒聂元梓的口号是错误的”，“希望北大两派在校文革领导下，在聂元梓领导下，把大家联合起来”，“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走”。

3月26日 “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校门闯进北大，与“新北大公社”发生武斗。

3月27日 江青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讲话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

3月28日 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高云鹏等策划，聂元梓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双方发生武斗。高云鹏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3月29日 凌晨1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双方100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严重损失。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赶到武斗现场，发表广播讲话，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要求两派各派五名代表“由校文革、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李钟奇说：“我今天到现场制止武斗时，有人拿匕首刺伤了聂元梓”，要求全校动员“把凶手抓起来”。

“井冈山兵团”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当日上午11时，李钟奇作第二次广播讲话，再次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他并宣布：

为制止武斗，组织调查组调查。

晚，两派代表开会。谢富治、温玉成（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参加。谢富治讲话说：“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并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二）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回，回去作自我批评；（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会上，谢富治批评“井冈山兵团”斗争聂元梓，说：“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

当日，校文革发出抓捕凶杀犯的《通缉令》。

4月1日 驻校解放军代表传达温玉成两点指示：（一）两派广播台坚决停止播发有关引起双方群众对立情绪内容的稿件；（二）严格禁止制造和向校内运送武斗工具。违者，以挑动武斗论处。

▲“井冈山兵团”发表《第一号动员令》，称：“刺杀聂元梓是对井冈山兵团进行政治陷害”；号召其成员要“揭发这个大阴谋”。

4月4日

▲晚，李钟奇来校，限令“井冈山兵团”三天内交出刺伤聂元梓的凶手和后台。

4月11日 北京市革委会、市公安局军管会、校文革组成的“制止北大武斗监督检查小组”负责人作《关于揪出反革命凶杀犯及其后台的广播动员》讲话，说“井冈山兵团”至今不交出凶手和后台，“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的行为”。

4月25日 “井冈山兵团”总部派武斗人员驱赶住在36楼的“新北大公社”的成员，占据了36楼。

4月26日 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36楼，双方发生第二次大武斗。孙蓬一、高云鹏亲到现场指挥。这次武斗造成双方二百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此后，聂、孙又下令攻占了25、27、17、18、19、21、22、23和24等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等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了以黄树田为总指挥的“新

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以宫政香为总指挥的“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

5月底 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给江青。

在此期间，由专案组负责人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三个多月，逼他们交代“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高位截瘫，终身致残。

6月14日 《新北大》发表《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的文章，说化学系63级学生樊能廷是刺杀聂的“凶手主犯”。

6月24日 北京运输三场给困守在28楼的“井冈山兵团”人员送菜，高云鹏令武斗队员从东西两面包抄，双方发生一场武斗，砸坏了汽车，打伤了三场司机。

6月27日 “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表《关于彻底砸烂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第三号公告》。《公告》将原“红旗飘”的九个学生点名定为“现行反革命”或“骨干分子”，说，这是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必须坚决镇压”。

上半年，校文革在校内44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多处及“井冈山兵团”在28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其中党委书记陆平被关押在生物小楼内，曾被用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逼供。

7月22日 校文革决定对“井冈山兵团”占据的楼房断电、断水后，“井冈山兵团”即计划从37楼南墙外的高压电线上带电作业往楼内架接电源。为着接电与反接电，两派于今天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相互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群众伤残，并造成马路堵塞，332路公共汽车停驶。

7月27日 首都工人、解放军（又称工农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当晚，聂元梓、孙蓬一召集系文革主任、“公社战斗团”战斗团长联席会议，商量对付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高校的对策，商定：（一）拒之门外，让宣传队派代表与校文革商量；（二）抵挡不住则退入楼内，各自为战，做

到人在搂在；（三）最后不行，聂元梓就领着大家到北大荒去等。会后，连夜往楼内运送硫酸、燃烧瓶等物品。

7月28日 凌晨3时至8时半，毛主席召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聂元梓、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质学院）等五人。

▲当日，校文革发了一个《立即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工具，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但《通告》仍强调要落实谢富治3月29日宣布的“四项决定”。

“新北大公社”总部发了表示支持《通告》的《声明》。《声明》同时要求对立一方交出“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和一切漏网分子”，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

8月19日 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

8月20日

▲晚，宣传队有关人员与聂元梓及校文革的全体常委（包括分裂出去的）作第一次接触。宣传队向聂元梓、校文革提出三个质询的问题，要求解答。如：为什么“井冈山”不承认校文革，校文革采取了什么态度？校文革支持武斗，提供武斗方便，要不要承担武斗所造成的损失的责任等。接着校文革做出四项决定：

（一）主动到“井冈山”住区帮助拆除武斗工事；（二）把未领的工资给“井冈山”人送去并检查错误；（三）聂元梓接受批判；（四）给“井冈山”人解决吃饭问题；以后政治、经济、生活上一律平等。

8月28日

▲宣传队发出《通告》，宣布要回到各班系去，由宣传队领导，按班系搞大联合。

9月下旬 工、军宣传队领导的全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全校干部、教师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九百多人被重点审查。

10月15日 宣传队召开三千人大会，聂元梓就校文革保卫组砸“井冈山摄影组”一事作公开检查。会上，批评聂元梓仍搞派性活动，无视和对抗工宣队的领导。

11月2日 宣传队指挥部向北京市委写了《关于不同意聂元梓参加市党

代表会议的请示报告》，未获批准。

11月21日 宣传队组织六百人会议，对聂元梓进行“再教育”。对她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腐朽的两面派作风”作“严肃批评”。“新北大公社”有的负责人揭发说：聂当了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总嫌自己权小，聂讲，“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不如当民主人士呢”。

12月11日 宣传队召开全校“宽严”大会。对牛辉林等七名学生进行处理。

12月18日 第二期为人民服务学习班今天开办。学员全部是哲学系的，主要是校文革聂元梓、孙蓬一及哲学系的有关人等共19人。

1969年

3月24日 上午，8341部队81名军宣传队员在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率领下进驻北大。

4月24日 宣传队召开全校大会。领导小组组长刘信作《用毛泽东思想对照检查前段工作》的总结报告。其中，总结了（前段）对两派群众组织“一碗水没有端平”等问题。

5月19日 宣传队《简报》报道：16日、17日，召开一机关干部“揭发、控诉、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大会”，动员原党委干部出来揭发、批判陆平的问题。

6月26日 《北京大学简报》说：全校通过讲用会，提出了“井”（井冈山红卫兵）、“红”（红色造反联军）问题。《简报》说：“1966年10月至1967年2月，从‘井’、‘红’成立到被摧垮，聂元梓等人犯了严重错误。他们在‘反聂即反动’的口号下，将‘井’‘红’视作反动组织，揪斗了‘井’、‘红’战士二百多名，其中一百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6月29日 宣传队一个月来，在各系普遍召开“三忠于”讲用会后，于今日召开全校“三忠于”讲用会。由两派负责人聂元梓、孙蓬一、侯汉清、孔繁、杨克明作“讲用”。聂在讲用中承认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说：“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派人搞枪枝，为武斗升级作准备。为摧垮‘井冈山’，（我）大抓反动小集团，扣压工资、助学金，

甚至断电、断粮，往28楼里灌水……还随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聂还承认掌权后，“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合我意的就执行，不合我意的就不执行，甚至歪曲，断章取义。”“在校文革中搞小圈圈，排斥异己，搞地下常委……来维护一派的利益（校文革）变成了派文革”等问题。

7月3日 8341部队进校后，宣传队内部经过一段总结检查工作，调整清队政策，统一思想后，于今日开始继续推进（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7月17日 宣传队领导小组向市革委会上报《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的工作总结。该文归纳前段工作的主要错误是：对两派群众组织“一碗水没有端平”；“没有解决聂元梓一派掌权的错误”；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中，“继续了校文革打对立派反革命小集团的错误，清队扩大化”。这份文件说：校文革“实行‘亲我则亲，冷我则冷，打我则打，反我则反’的原则”，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它后期变成了“一派掌权”的“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把大批师生员工“打成反革命”。宣传队在“（1968年）10月至今年2月的清队工作中”，继续了校文革的这一错误，“先后立了许多专案”。宣传队在搞专案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搞“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唯恐放过一个坏人，从不考虑冤枉一个好人”，结果“打了一批‘反革命小集团’，批斗了许多人”，一些“根本没有问题的人……也被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的‘外围’和‘外围的外围’”；“揪陆平黑班底”，把干部打成“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或“第三势力”；“对已做了正确结论的历史问题，也要‘老账新算’”。文件着重总结了8341部队进校后纠正上述错误，“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的经验。

8月底 宣传队领导小组副组长王连龙介绍北大清队情况说：从1968年10月开始的大规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至此基本结束。一年中被重点审查的共九百多人。

9月4日 宣传队领导小组向市革委会上报《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1969年）7月上旬转入（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至9月2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51个反动组织；在现有4711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3人，特务55人（其中潜伏特务1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1人，现行反

革命分子（内含1名学生）9人，地、富、坏分子14人，共102人。其中大部分人已经定案处理，给13个右派摘掉了‘帽子’，还清理了一些人的非敌我矛盾性质的重大历史问题，澄清了3个人的问题，从而使北大阶级阵线基本明朗”。

9月27日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10月2—4日 北大接待各省市国庆观礼代表6508名。宣传队向代表们介绍了北大、清华“创造”的清队、整党、大批判的“经验”。王连龙介绍解决一派掌权问题时说：“校文革在中后期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实际上变成了一派的文革、武斗的文革、逼供信文革”。他们“搞逼供信，如把对方樊××抓去，将十个手指，十个脚趾都用钢针挑起来，膝盖骨上钉钉子，胳膊、小腿都打断了，造成了残废，硬逼人家承认反对毛主席……这是资产阶级派性专政，不是什么红色政权”。

10月17日 北大宣传队、革委会召开第五次落实政策大会。从宽处理32人，从严1人。会上宣布：“继续清队，一清到底”，做到“坦白交待不停，检举揭发不停，内查外调不停，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不停”。

11月26日

▲校宣传队、革委会教育革命组提出了《关于深入教育革命的几点意见》，强调教育革命全面铺开应进一步明确“教改先该人，改人先改魂”，并提出……。

1970年

1月27日 哲学系孙蓬一、高云鹏等给宣传队贴大字报（即一·二七大字报），指责他们不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犯了右倾错误。

1月 宣传队决定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要求开展大揭发、大批判（极左思潮）、大清查。

2月6日 校革委会主任杨德中主持召开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全体成员会议。迟群在会上发言，对孙蓬一等人写的大字报（一·二七大字报）进行批判，迟说孙蓬一的问题，实质是要向工人阶级夺权。会议对校文革搞武斗、搞逼供信、搞扩大化、打死中学生等问题提出要查清。孙蓬一表示对批评不能接受，保留发言权。

2月24日 江西试验农场召开揭发、批判孙蓬一反动言行大会，说要“揭

穿孙蓬一资产阶级右派的真面目”。

3月9日 江西试验农场继续召开揭发、批判孙蓬一发动言行大会。

3月12日 江西试验农场召开全场“一打三反”动员大会（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3月27日

▲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宣布毛主席对北大宣传队清队、整党、教改三个经验的指示及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时加的按语。

7月中旬 聂元梓被从江西试验农场叫回总校。她表示要向宣传队领导小组检讨，并提出检讨是长点好，还是短点好？能否看看工农兵新学员，和他们见见面？

7月25日 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发出关于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的通知。通知号召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7月27日 全校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揭发、批判他在炸毁汉中汉运司大楼（即1967年“八一九”炸楼）的流血事件中的问题。在该次炸楼事件中，有18人死亡（按当年的材料说有29人死亡）。会上，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负责人宣布把高云鹏交由汉中地区人民批斗处理的决定。

11月28日 《内部通讯》发表短评，要求“一打三反”运动要“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揭发、群众性的查证、群众性的分析、群众性的批判”，把“五一六”分子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反党阴谋家“通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期，还登了《权迷心窍的野心家》等揭露聂元梓为首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反党”、“反军”、“武斗”、“杀人”等问题的文章。

12月3日 《内部通讯》继续刊登揭发批判“五一六”罪行的文章。主要内容为批判聂元梓的“野心家”言行，如“三年文化大革命白干了”、“17年掌权经验不能用了”，以及“上揪下扫”、“揪军内一小撮”等。

▲《内部通讯》还刊登《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说，在对敌斗争问题上，有什么清什么，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行的；不论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还是其他反革命秘密组织。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

像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在清查“五一六”问题上，不论在组织上加入了“五一六”，履行了组织手续，还是没有加入组织履行什么手续，他们的观点、立场、所干的罪行和“五一六”一样，就可以定性。……；把态度老实和不老实加以区别。处理中，就是骨干分子，交代了罪行的，也可以从宽处理。

12月16日 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会议提出清查聂元梓的问题，要求先在小范围内揭发、查证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江西分校八连召开揭发、批判孙蓬一的大会，全分校新学员参加。

1971年

2月9日 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召开揭发、批判聂元梓的大会。这次主要揭发、批判聂在“文化大革命”中策划武斗、打死无辜学生的问题和她的两面派问题。

2月17日 学校于12日、16日17日连续召开大会，揭发、批判聂元梓反军乱军问题和反对“五七”指示的问题。六个知情人在会上揭发。会后，各系对聂在校文革掌权期间的问题，开展了大揭发、大批判和控诉、声讨。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决定并宣布对聂隔离审查。

2月26日

▲学校召开第五次揭发、批判聂元梓的大会，同时批判高云鹏。

3月5日 江西分校召开揭发、批判孙蓬一、聂元梓（人在总校）反军、乱军问题大会。会后，各连对犯有反军问题的重点人作政策攻心。

5月22—24日 第六次党代会继续开会。哲学系李中华、政工组代表郭宗林做了揭发、批判聂元梓的发言。揭发聂元梓的主要问题有：（一）分裂革命群众队伍，破坏革命大联合，挑动武斗，镇压群众运动；（二）疯狂反军乱军；（三）分裂党中央、阴谋颠覆新生红色政权以及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权欲狂”等。

5月24日 中共北京大学第六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杨德中、王连龙、刘信、田双喜、迟群、谢静宜、魏银秋、郭宗林、回登昌、卢洪胜、周进生、车凤喜、张学书、马振明、周培源为常委，选举杨德中为党委书记，王连

龙、刘信、田双喜、张学书为副书记。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中共北大党委《关于认真读书、批修整风、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决定》。杨德中在会上说：“聂元梓还是要闹的，此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要继续审查。”会议提出，聂元梓校文革后期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

6月9日 清查办《情况反映》：清查“五一六”运动以来，聂（元梓）线隔离审查对象共10人；“牛线”（井冈山牛辉林）隔离审查共7人。

1972年

2月10日 校党委常委会听取“五一六”专案组的审查汇报。汇报说全校“五一六”专案重点审查对象共117人。

5月6日 年初开展的批林（彪）贼、肃流毒、划界限（即批、肃、划）的运动至今日暂告一段落。

5月31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五一六”清查办公室汇报说，北大（文革期间）参加的“围困中南海”等九件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已基本查清，可定（“五一六”）主犯2人，从犯9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人，打死人的凶手5人（有3人另作处理，1人暂不定），受蒙蔽的80人（其中考虑给一定处分的10人，在档案上记一笔的24人，另46人档案就不记了），经审查排除的16人。还有36人未查清。

6月26日 校党委常委会讨论确定，北大（在校文革时期）的重大反革命事件有：“围困中南海”、“午门抗缅大会”、“利用‘0007’密令调查周总理的黑材料”、“反军乱军”、“组织人员到国务院各部调查（根据陈伯达的指令）”等。这些都是“五一六”案犯的罪行，聂（元梓）孙（蓬一）是这些事件的主犯，还有从犯多人。

10月18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认定聂元梓、孙蓬一是犯了“五一六”罪行的首恶分子，提出暂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的处理意见。

10月19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同意对孙蓬一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从严处理，清除出党。

11月22日 校党委常委、革委会常委开会讨论《北大、清华两校清查“五

一六”工作的情况报告》，再次确定聂元梓、孙蓬一是敌我矛盾。

1973年

2月21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会议认为，经二年清查，北大九件重大事件及涉及的117人的问题已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两人，胁从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13人，被蒙蔽、犯有政治错误的14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排除的16人，其他问题72人。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聂元梓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由群众监督，以观后效，报上级批准执行；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孙蓬一是助恶有据、民愤极大的从犯，决定戴帽子，劳动改造。

3月1日 校党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聂元梓、孙蓬一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专案组汇报：对聂元梓从1970年11月开始审查，现基本查清。主要有五大罪行：（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从1967年开始就反对周总理；（二）反军乱军；（三）反对谢富治，反对市革委会；（四）策划武斗，残杀群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无辜青年学生；（五）破坏九大路线，反对党中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追随林彪反党集团向党进攻。

汇报说，孙蓬一的主要罪行是：（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反周总理；（二）伙同聂元梓反谢富治、妄图颠覆市革委会；（三）挑动武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青年学生，包庇凶手。

会议决定：同意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

会上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结束。

4月13日 校革委会向市委写报告，提出“将聂元梓放到新华印刷厂，白天和工人一起劳动，晚上专人看管”的要求。

8月3日 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迟群讲话，提出要注意意识形态的斗争，抓右派。他说，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隔几年就要搞一次抓右派。我们一讲改造世界观，同工农结合，掺沙子，有些人就不愿听。我们要提醒有些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能就是发动群众反右派，你不要犯经验主义！

迟群对招生进行文化考查表示反对。

11月28日 校党委召开党总支书记会议，继续部署教育革命总结、批资批修运动。提出运动以揭为主，一揭到底，把每个角角落落的资产阶级势力都要扫一扫，把那些“小团团”甚至是裴多菲俱乐部攻开，揭深、揭透。会议再次要求各级领导检查有无右倾思想。

12月5日 校党委召开党总支书记会议，继续布置反右倾回潮运动，提出下一步运动的提法是：深揭深批，揭批结合，一揭到底。要求继续克服右倾，防止运动流产，对资产阶级势力决不能手软；对少数（重点）人，要集中火力；对“小团团”，要选择突破口，加以分化瓦解。

12月10日

▲运动办公室统计：各系上报的要重点批判的人共40名。

1974年

11月15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研究、贯彻市委落实批清（清查“五一六”）政策会议精神。市委的会议提出：（一）三类（指犯严重政治错误者）不算“五一六”分子，定四类者审查材料不入档案；（二）已经定案的进行复查，材料不实、定性偏高、表现较好者可以重新处理；（三）定为一、二类的人也要复查，属市委批准的要上报；（四）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五一六”是极少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定性处理）就低不就高。敌我矛盾降为内部矛盾者，审查材料要重搞。定为三类的人要降一降。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不能采取低头认罪的办法，对北京地区五大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的定案处理，要报中央审批。（五）要坚决贯彻中央（1974）26号文件精神。常委会议决定：全校已定为三类的15人，要复查，没处理的处理完；三类以下的审查材料登记造册后销毁。

11月30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听取批清复查情况汇报：全校批清立案共117宗。其中犯一般错误的人的审查材料，常委已同意登记造册后销毁。

12月1日 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批、清落实政策问题。会议决定：聂元梓、孙蓬一属敌我矛盾，材料已上报，要开展批斗。对已定为三类的15人，

复查后的意见，可上可下者可考虑降为四类。会议决定，其中8人仍定为三类，7人可降为四类。

1975年

4月18日 经市委书记吴德同意，校党委会决定，将聂元梓从新华印刷厂（原在此监督劳动）调回学校，放到校仪器厂钳工车间监督劳动，继续审查。

1976年

11月5日 校党委召开党委委员、总支书记会议，宣布：（一）北京市委、市革委会关于拘留审查两校大批判组业务组长、党支部副书记宋柏年的决定，同时宣布宋已由北京卫戍区（4日）拘留审查；（二）要组织学员、工宣队队员、教师、干部进驻两校大批判组；（三）魏银秋学习班放到化学系；（四）聂元梓、孙蓬一或其他坏人跳出来，要狠狠批。（五）决定从各系调18人充实校运动办公室。

1977年

1月20日 哲学系总支、武保部向党委上报《关于聂元梓、孙蓬一的情况报告》。《报告》反映：聂元梓声称她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审查她是不对的；孙蓬一到哲学系闹，说他是受江青迫害的。

2月15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传达市委负责人2月14日听取北大、清华运动汇报后的指示精神。市委领导讲，……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包括两个估计。毛主席批准的，不能动摇。……十七年不能翻，两个估计不能翻，聂、蒯的案不能翻。上述精神只传达到常委范围，不能外传。

1978年

1月17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通报聂元梓要求周林转给邓副主席、华主席的信。聂在信中不承认自己有反周总理的罪行，也不承认与康生、“四人帮”有

联系。会议决定，加强聂元梓的专案工作，由戈华挂帅，张学书具体负责，抓住主要问题进行清查。

1月25日 校党委向华主席、党中央报送《关于聂元梓问题的报告》，并附1977年12月6日聂元梓给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信。报告提出，拟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批斗聂元梓大会，请中央批示。报告抄报北京市委和教育部。

3月22日 上午9:55—10:35，邓副主席约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及北大的周林、高铁、韦明、汪小川，谈北大工作。邓副主席问，北大的运动怎样？有人反映冷冷清清。聂元梓现在怎样？（周林答：她要翻案。）她有什么可翻。聂元梓，为什么你们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邓副主席要北大搞出个样子来，总要搞个经验出来。邓问到，周培源任命了没有？并要北大几个书记住到学校。北大至少招两万人，教师力量是足够的，可以开大课。学校秩序要整顿，办成大世界怎么能行？

3月31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传达邓副主席3月22日对北大工作的指示。决定分工负责整顿中层；对反动小字报开一次全校大会进行批判；加强清查工作和落实政策工作，……；对聂元梓、孙蓬一进行隔离。

4月1日 市委批准将聂元梓、孙蓬一及打人凶手贺彦生三人隔离审查。

4月7日 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对孙蓬一的审查及处理意见报告》。《报告》提出将孙蓬一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

4月8日 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对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报告中附：（一）周培源1978年1月8日写的材料：1973年7月17日，毛主席接见杨振宁博士时，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当时周培源说：“陈伯达是她的后台”。毛主席说：“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二）李正理1978年1月19日写的材料：1971年5月19日，周总理在接见美国高尔斯登和西格纳二位教授时，谈到北京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冲击教授时说：“北大有个女人很坏，这些都是她搞的。”

▲下午，校党委召开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大会由党委副书记高铁主持。

中文系教员成美，经济系教员杨勋，生物系党总支书记胡寿文，西语系教员郑培蒂在会上发言，揭发聂、孙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暴行。

4月19日 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员工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在会上揭发、控诉的有：华东师范大学代表夏鹤令，我校生物系毕业生、湖南临湘县572分校教员樊立勤，地质系教师王永法。党委副书记韦明在会上宣布：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党籍，开除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的公职，建议依法惩办。宣布后，由专政机关依法逮捕了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

4月29日 校党委报告方毅副总理并转邓副主席（抄报胡耀邦），要求将涉及康生、曹轶欧的三封信，在我校80周年校庆时举办的“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急先锋聂元梓、王连龙、‘梁效’罪证展览”中展出。

5月4日

▲学校举办“梁效”、王连龙、聂元梓罪证展览，预计5月13日结束。

6月16日 校党委书记周林在大组会（干部会）上对常委小整风做了总结发言。他说，常委搞了四个半天小整风，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说“基本上”，就是因为学习讨论的时间短，问题还没有讲透，特别对北大历史上一些问题还有些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北大的社教问题，张磐石那一套。明明白白，路线上是错误的。我们搞这个问题，目的是澄清是非，团结多数，调动积极性，不是算哪个同志历史上的旧账，更不是要整谁。但聂元梓的账是要算的。由于批了聂、孙，才更有条件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我们内部对社教问题上存在的思想分歧和干部间的不团结现象。

7月4日 校党委召开全校党员干部会，党委书记周林做报告：（一）通过小整风，常委认为：北大的十七年，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基本的。只有紧密联系北大十七年的实际工作，批深批透“两个估计”，把张磐石、聂元梓、王连龙强加给北大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才能真正分清路线是非，彻底砸烂长期压在北大广大干部和群众头上的精神枷锁，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二）……在深入揭批聂元梓的斗争中，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整顿各系的领导班子。学校正在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

9月1日 校党委召开全校落实党的政策大会，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

及其代理人聂元梓、王连龙等人践踏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的罪行；推翻他们制造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错案和清队假经验，为受到诬陷打击的干部、教师、工人、学生昭雪平反。

10月8日 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关于揭批和清算聂元梓一伙罪行的请示报告》。《报告》要求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聂元梓的罪行。《报告》同时抄报邓副主席和方毅副总理。

12月5日 11月24日至12月5日，校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由党委书记周林做了总结。他说：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大的若干历史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他传达了北大1978年11月13日向华主席、党中央的报告，说此报告华、叶、邓、李、汪均已圈阅。报告中提到的历史问题有：北大的社教运动、关于“第一张大字报”、关于工作队和“六一八”事件、关于揪叛徒兵团问题、王连龙问题、“梁效”问题。他说，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策划的，是个圈套、大骗局，欺骗了毛主席、党中央。批判第一张大字报，有利于增强团结，更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

12月19日 校党委召开全校揭批康生大会，党委副书记高铁主持大会。国际系主任赵宝煦、化学系教师李南强、西语系副主任严宝瑜分别就北大社教问题、聂元梓大字报问题和“六一八事件”问题进行了专题揭发批判，历史系66届毕业生杨绍明、经济系党总支副书记杨勋进行了揭发和控诉，党委书记周林在会上讲了话。

12月

▲北京市召开批判聂元梓大会。

1979年

2月22日 中北京市委做出《关于为原北京大学党委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说：文革开始，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抛出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并组织人炮制了评论员文章，污蔑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污蔑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同志和副书

记彭珮云同志是“三家村黑帮分子”。《决定》说“这些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与全部推倒”。

8月29日 校党委向中央组织部陈野萍并耀邦报送有关孙蓬一是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康生和江青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主要助手的材料。报送材料原因是王若水将孙蓬一家属的申诉以及王若水的意见转给胡耀邦。耀邦做了批示后，学校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孙蓬一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复查核实，写出了上述材料。

11月13日 11月10日、13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研究学习问题和年前工作。……高铁说，最近邓副主席批评过我们两次，一次关于生活问题，已经传达过了。另一次，在政治局讨论文化部文件的会上，邓副主席又批评了北大。邓副主席说：“发扬民主的方针不放弃。但讲民主也要讲集中，讲自由也要讲纪律。北大有争论，有几个人要踢开党委。郭罗基要调走。对有的同志要批评，批评方能保住旗帜。大字报要求改组党委，学生大字报的要求是合理的。闹，实际上是聂元梓的人”。

1980年

3月19日 按照1月30日市纪委筹备组的要求，我校整理了一份《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房屋建筑的罪行》材料上报。其中说，1967（抄录者注：应是1968）年3月，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使学校的房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以28楼“井冈山”总部为中心的周围17、19、20、29、30、32、34、35、36、40楼等11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的门窗玻璃，门窗扇全被打碎。28、30、35、36、37五栋楼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这些楼内的家具设备（其中28楼是留学生用的家具设备）都被砸毁。聂元梓、孙蓬一为了大规模武斗还损坏了五四运动场的20万块红砖，并且挖了地道（从37楼—36楼—35楼—30楼全部从地下2米深处挖成宽1米高1.7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基础受到损害。为了搭天桥，把35、36楼的屋架风撑也给拆除了。……。

8月21日 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受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

平反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抛出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并组织人炮制《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诬陷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珮云同志，这是一起冤案。中共北京市委1979年2月和3月已为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珮云同志做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按照中央的规定，现将中共北京市委这一决定转发给你们，并请转发到县团级党委，以消除不良影响。

中央组织部 1980年8月21日

11月1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党中央决定开除康生、谢富治党籍》。其中说：“鉴于康生、谢富治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党中央决定向全党公布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党中央公布康生的大量罪行材料中有一项即：“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幕后策划下炮制的”。

1981年

5月6日 校党委开会，讨论对王连龙等人以及“梁效”成员的处理问题。决定：王连龙、魏银秋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给予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送回部队；郭宗林定为犯政治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送回部队；李家宽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宋柏年定为犯政治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王世敏定为犯政治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其他人员（包括“梁效”的其余人员35人）定为说错话、做错事，不予处分。以上处理上报领导机关平衡，以上级批示为准。

12月22日

▲校党委向中共北京市委报送王连龙等五人送回部队，等待处理的请示。请示说，我校原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王连龙、魏银秋、郭宗林、李家宽、霍生杰等五人在北大期间的问题，已经我校审查清楚，拟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并分别提出

了处理意见，上报市委审批。

1982年

4月20日 校党委常委会开会，传达4月12日中央书记处第170次会议纪要中关于郭罗基问题的处理意见：对郭罗基的错误，由宣传部、教育部正式通知北京大学党委组织批判；同时组织部通知教育部将他调出北京。要明确告诉郭罗基，如再不服从组织调动，就开除他的党籍（开除了党籍，也要调动）。会议决定坚决按中央书记处指示办。

11月17日 “文革”期间任北大校党委常委的谢静宜，因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经中央警卫团党委决定开除其党籍。鉴于其承认犯罪事实，并揭发了同案犯的罪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免于起诉。

1983年

1月18日 市纪委批复：1978年4月逮捕聂元梓时，已经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并报请中央批准后宣布开除其党籍。现经司法部门审理后证实聂元梓确犯有严重罪行，即将依法判决。据此，经我们于1983年1月5日报请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同意：对聂元梓的党籍处理即按原已宣布的开除党籍执行，不再另行作决定（其罪行结论以法院最后判决书为准）。

▲市纪委批复，1978年4月逮捕孙蓬一时，已由你们决定并报请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宣布开除党籍。现经司法部门审理后证实孙蓬一确犯有罪行，即将依法处理。据此，经我们于1983年1月5日报请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同意：对孙蓬一的党籍处理即按原已宣布的开除党籍执行，不再另作决定（其罪行结论以司法部门最后的法律文书为准）。

3月16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依法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7月13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孙蓬一有期徒刑十年。■

2014年12月

【读者来信】

谢定国谈自己的文革日记

我那本日记，如果还算青铜器的话，还在，没有去锈翻新的清理。在华夏文摘上的发表稿，也就好比一张旧物的数码相片吧。考虑到最广大的读者，不是历史学者，作了些技术处理。例如：更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增补修改了些标点，修订了一次重复月份的错误。还删节了估计有几千字吧，主要是在桂林的芦笛岩游记，和抄的一些大字报，如毛主席和王海容的谈话等。另外因为隐私的原因，用了一些化名和代词，如“某些人”等，有时甚至删掉了主词。

《记忆》如果希望尽量一字不改不删的作为原始历史材料发表，我没有意见，可以将影印件发给《记忆》。但条件是我已经使用的化名，必须保持，但可以注明这是化名。

日记的影印件，我已经提供给《华夏文摘》的华新民先生，也愿意提供给贵刊将来出北大文革专集。但在无删节版正式发刊前，因为涉及隐私而化名的原因，我不想提供给更多的人。望能谅解。■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